

十

日本的移民侵略

以史实为镜鉴，揭侵略之罪恶；
颂英烈之功勋，扬抗战之精神。
www.krzzjn.com

以史实为镜鉴，揭侵略之罪恶；
颂英烈之功勋，弘抗战之精神。

www.krzzjh.com

开拓特别会计的设立

古海忠之

伪满洲国编订1939年度预算时，为了迎接日本开拓移民事业的飞跃发展，设立了开拓总局（它是产业部的直属局），又创设了开拓事业特别会计。此项特别会计是为了把过去满洲殖产公社所实施的收购开拓地的业务，移交给伪满洲国而设立的。同时，还决定了开发未利用土地的方针和办法。也就是说，政府从1939年起，要在三四年的期间内，取得伪满全境的约有2000万町步的未利用土地，对此实施农地造成事业并整理和筹备日本人的开拓用土地。这种开发土地的全部计划是相当庞大的。施工总面积有1500万公顷，其中预定农地造成的面积有613万公顷（水田是133万公顷，旱田480万公顷）。所需总工程费达54.5亿元。因此，收购开拓地和农地造成，成了极其重要的事业。在该年设立了承包政府农地造成工程的“满洲土地开发会社”。该会社在1939年制订了农地造成的计划及其设计，并从1940年开始施工。从1940年到1942年，有关施工面积约有40万公顷（鹤立岗、莲江口、新开河、昌图、黑台、裕尔河、甘南、双阳、通化等），预定农地造成的面积约19万公顷（水田约8万公顷，旱田约11万公顷），完成了农地造成的面积约3.5万公顷（水田约1.8万公顷，旱田1.7万公顷）。在此期间，伪满政府虽声明过不收买熟地，但仍没有兑现，由于农地造成工程的需要和其他原因，不断地以低廉价钱掠夺了熟地。甚至发生过计划收购甘南全县土地的暴举。当地居民和劳工在施工中，被奴役被迫

害的情况更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日本帝国主义在1940年11月颁布的“日满华经济建设要纲”里面，要求伪满洲国成为日本的粮食基地。而伪满洲国又在“日满华经济建设连紧要纲”和第二次产业开发五年计划里，响应了这种要求。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促使日本急速地增加了对伪满洲国的粮食需要，并逐年增加了它的要求。伪满洲国为了完成这种支援日本的使命，以增产农作物为最根本的解决办法，决心大规模地开发农地造成事业。从1943年起开始了紧急农地造成，并把它当作最重要的国策。决定了包括第二松花江下流和东辽河地区在内的，约25万公顷紧急农地造成的方案。为了取得日本方面的协助和支援，交涉的结果，意见完全一致；在该年11月，日本政府在内阁会议上表决通过了“关于支援满洲国紧急农地造成计划由”。该方案是用两年的时间（1944年和1945年），在松花江下游地区和东辽河地区改造成水田约7万公顷，在以前已经施工的地区即鹤立岗、莲江口、太平镇（以上三江省）、黑台、新开河、饮马河、岔路河（以上是吉林省）、甘南、康平、盘山等12个地点，完成水田6.1万公顷，旱田11.5万公顷。它需要数千万个人工，这部分劳动力计划由勤劳奉公队和从各市县旗征用的劳工来充任。工程完成以后，把它当作开拓用地，向这里移殖日本开拓民和朝鲜开拓民，至于旱田规定以后再作决定。并决定因改造农田而生产出来的粮食除当地自己消费的一部分以外，全部充作对日支援的物资。该年12月在总务厅设立了紧急增产推进本部，武部长官任部长，我任副部长，它是统一领导和具体执行重要物资的紧急增产计划的一个机关。于是和煤的增产一样，农地造成变成了主要问题。1944年2月，为了迎接大规模地紧急农地造成，为了积极迅速地开发开拓用地，把“满洲土地开发会社”加以改组，

重新设立“满洲农地开发公社”(资本金5000万元),作为伪满洲国的特殊法人,使其成为执行紧急农地造成事业的核心组织。根据兴农部大臣的命令:要在1944年和1945年两年内,在上述地点,施行约25万公顷土地的农地造成。所需资金总额为26700万元。并和日本政府达成协定。规定日本政府对该公社补助和日本的情况相同比率的补助金(第一年为1000万元);从日本“农地开发营团”抽调60名以上的技术人才支援公社;还规定在资材方面援助抽水机、混合机、拖拉机、机车和铁轨等物资。并从1944年春天一齐开工。

于是,开始了伪满洲国的紧急农地造成事业,平时经常使用着15万左右的劳工。1944年动员勤劳奉公队仅2万人,大部分是使用着从各市县旗征用的劳工;可是1945年仅勤劳奉公队就动员了将近10万的队员。不管怎样,我相信,动员总数达30万人。征用劳工和勤劳奉公队都是以强制劳动为其本质。因为是紧急工程,采取了彻底压榨的办法;生活设备和给养是特别恶劣的,又强迫长时间的苛酷劳动,因而很多劳工和队员损害了健康,甚至牺牲了性命。当我想到,为了移殖日本移民,为了支援日本帝国主义粮食,许许多多的人被迫害的情况,内心有说不出的苛责。至于掠夺农民土地的严重罪行,那更不必说了。

紧急农地造成不仅是在中央,就在各省也有制订计划加以执行的。滨江省实施了防水土地开发事业,为了完成第一期计划发行了120万元的省公债。奉天省及其他省也设置了农地改造事业特别会计,计划以1900万元的预算来执行该项事业。因此,不论是中央还是地方,上述掠夺行为遍地皆是。

东宫铁男的移民政策

周大鲁

东宫铁男是日本的陆军大尉，1932年来东北，充当伪满洲国军事顾问，分派在吉林剿匪军总司令部。同年夏，他率领总司令部进驻依兰。而后以依兰为根据地，进剿松花江两岸地区，收抚了滨江镇守使丁超，赶走了依兰镇守使李杜、刘斌。这时，东宫兼任了江特务机关长，由军事侵略转向政治侵略了。

东宫铁男外装诚实，内藏阴险，且有权术，不但把剿匪军的各部队长都把握住了，而且下江地方政、商、民等各界首脑，很快地也都被他笼络在手里。他整天穿着中国衣服，常常到各县镇去。依兰永丰镇一带肥沃的土地，打动了东宫铁男移民侵略的野心。

东宫铁男的移民政策是武装移民。其目的是因为军事的长期镇压，不如移来武装移民团体，永久地定居更为彻底。鉴于台湾移民失败的教训，他要实行集团为单位的武装移民。他的这个计划经关东军司令部批准，很快就着手实施了。关东军命令驻依兰的饭冢联队长主办这件事。饭冢在依兰召集了县和地方首脑开会，决定强收永丰镇一带的土地。他说：关东军命令把永丰镇到湖南营一带（这个区域内土地约2万垧，居民1000多户）的土地，收归日本的移民团耕种，你们回去告诉这一带居民，准备缴照搬家。永丰镇的代表提出了减收和缓期的两个问题，遭到了饭冢的横暴拒绝。其他人都畏于其压力，不敢再说什么了。饭冢以为这次会议之后，土地算收妥了。会后，他

方代表回去把会议的事情向村民说明，竟激起了村民的极大公愤。几天之后，饭冢联队长就乘汽车（共计三辆），亲自去永丰镇收缴地照。行到土龙山附近时，起来反抗的农民颠覆了饭冢的汽车，杀死了饭冢以下日军十几名，农民也有伤亡。事后当地农民畏祸四散逃避，抛家舍业，十室九空，真是父子分离夫妻失散，情形非常凄惨。这就是世人皆知的土龙山事件。饭冢联队长收农民土地，其主谋是东宫铁男。

土龙山事件后，东宫铁男与依兰县长到永丰镇。他说：关东军买地的是为了实现日满亲善，把日本的一部分农民移到这来，和你们同住在一起，交换习俗和农业技术，土地要不了多少，在移民未来之前，土地可由你们耕种。他这种欺人的鬼话，广大民众并没有被他愚弄，因为都清楚地懂得，若是亲善为什么不让中国人民移到日本去，而把日本人移到中国来，还要强占土地呢？

1934年春，东宫铁男从日本带来第一批移民500名，全都武装。一部住在永丰镇附近，命名为“弥荣”开拓团；一部住在湖南营附近，命名为“千振”开拓团。当地居民从此就常常受到他们的欺侮。其后，每年都有移民继续前来，从第三次以后就有眷属了。

东宫铁男1937年春离开佳木斯回日本去了，晋升中佐，任第二联队附。后在侵华战争中被中国军队打死了。

开拓政策：日本的国策 人民的灾难

王允卿

开拓政策是伪满苛政之一。其创建之始提议最有力者为关东军东宫铁男。其意谓日俄战争日本死伤士兵有10万以上，此10万以上之士兵皆来自农家，其遗族概为无地可耕贫困已极的农民，伪满建国后与日本国结成不可分之关系，对此可怜之遗族，宜有相当之救恤。其法可将伪满之北部荒地招其来满实行开垦，不但边防上有日本民族的开拓团可以巩固，使俄人不敢南下，日本国之食粮不足，亦可因开拓团之移殖可以救济。此种开拓团可谓一举而三利也。自从东宫铁男之建议，尤其日本拓务省之主张，终于促成了关东军与日本拓务省共同制定百万户移民计划，移民500万人，分20年完成。此事由日本国库出资，伪满政府亦补助相当经费。为使此事实行之便利，特创立了满洲拓殖公社（简称满拓），初任总裁井上坪贞，继之为二宫中将，专门收买荒地，移民盖房，训练开拓移民。第一个日本移民村落为三江省的弥荣村，海城田庄台的开拓团，规模极宏大，如县市一般，日用品食料均能自造，学校医院等无不具备，而衣类用具亦由开拓团自办的合作社经营，不啻为日本国内村庄移至满洲，其设备之完整有过之而无不及也。开拓团立有神社，即以东宫铁男为开拓之父而奉祀之。此人于侵华战争时被打死，盖天罚也。

收买土地由满拓实行，满拓随意派员到全伪满各地调查、收

买，以北满荒地为主，于黑龙江、嫩江、松花江、辽河及图们江等沿岸凡有水利可种稻田，均能购买。收买农民的土地，概以半价或更低的价格付之，其地价定荒地每垧1元，二荒地每垧4元，熟地每垧20元，农民无力抗拒，只有忍受而已。有的地主因为土地为满拓收买后得价，再到其他地方买地者，又遭到满拓派人收买，既或是地主，也由于失去土地，再以二石二斗粮租回自己熟地耕种，作日本人的佃户。

日本开拓团员之募集，概以各农村中15岁以上之青年，经满拓施以相当之训练与教育后，分给土地开垦；还为开拓民募集配偶。一时之盛，日本青年男女均欲到满洲充当开拓团员。但日本移民无法抵挡北满天气寒冷，有的移民穿十几件衣服尚难抗寒，日本移民也深受其苦。

日本武装移民计划 出笼的前前后后

藤利贵

1931年9月18日爆发了满洲事变，使满洲政治经济改革出现了刻不容缓的局面。为配合这种新局面，从1932年1月起，在日本各地燃起了向满洲移民的烽火。同年2月，山形县一在乡将校前往访问陆军大臣荒木贞夫时，该氏从荒木大将处听到满洲农业开拓民事业不可能等悲观论后，便将此意转告加藤完治。加藤完治即刻往访荒木大将，经过一小时多的激烈辩论，荒木陆军大臣承认满洲农业移民的可能性。加藤完治便立刻与农林省石黑忠笃、小平权一、东京大学那须皓博士、京都大学桥本博

士等人进行研讨，决定立刻开展满洲移民运动。当时，立即拍电请公主岭农业试验所所长宗光彦回东京。宗光彦见电后即刻返回日本，并将其计划与满洲当地实际情况相结合，制成了日本移民具体方案。宗光彦在满洲事变前，便致力于日本农业开拓民移住满洲的事业，在满洲有20年以上的丰富经验，可谓开拓先觉之士。

不久，关东军司令部为征求各界对满洲农业开发，尤其日本人移住问题的意见，在奉天召开了会议。那须皓、桥本两博士应召出席。会议上遭到多数悲观论者的正面攻击，但是，军方认为日本人移居满洲是可能的，应当促其实现。因此，满洲开拓运动的开展，陆军省和关东军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满洲开拓事业逐渐实行，其主管机关应由拓务省移民局主管。正巧，移民局局长生驹高常与石黑忠笃是莫逆之交，石黑与生驹交谈后，拓务省移民局立刻着手于满洲开拓民计划。

1932年春，满洲开拓民实施预算送至大藏省，因当时财政困难，只批准了满洲移民调查费10万元的预算。遂由拓务省编成移民地区调查班，到广阔的满洲各地进行实地调查。同时，委托加藤完治及宗光彦调查移住地区的农业耕种方法和生活方式。拓务省的调查班在满洲有关部门协助下，于9月到满洲的中部及北部地区实行调查。同时，在关东军的协助下，加藤完治将其主办的日本国民高等学校分校，设于奉天北大营。受拓务省委托，为适应开拓事业需要，从国内招收了数十名农村青年进行实地训练。

与日本国内加藤完治等倡导满洲开拓运动的同时，在满洲的现役军人东宫铁男以极大力量从事这一运动。在满洲事变前，即1927年至1929年，担任奉天独立守备队中队长的东宫铁男，便开始研究日本人移住满洲的计划。满洲事变爆发后，东宫再

度来满，担任吉林剿匪军顾问。1932年4月，东宫率领军队沿松花江而下进行讨伐。经过三江省依兰县及佳木斯时，松花江下游一望无际的旷野，映现在东宫的眼前，当即促成其移住日本人的决心。随后，他执笔写出了将在乡军人编成吉林屯垦基干队，永久地屯驻在吉林省东北地带的意见书，并将其送呈关东军桥本参谋长。东宫的意见书，由其老上司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见到时，正值加藤完治来满，为在北大营开办日本国民高等学校分校，以及商议第一次移民地区选定事项。石原参谋遂将加藤、东宫两人共同约于奉天旅馆会面。两人相见彻夜长谈，意见完全一致，遂约定加藤担任国内移民的选拔和训练等事项，移民入满后一切事务由东宫负责。从此，满洲移民事业更加具体化了。

当时考虑到第一次武装开拓团移入地区的治安情况，根据判断，移入1000名受过教育的在乡军人，可能是无什么问题。移入地区选定在永丰镇，因佳木斯一带匪害尚难避免，故需相当的警备力量。当时，吉林军驻守在佳木斯，而日本军队常有移动，确实需要在乡军人与满洲国兵共同协助。1932年10月，500名经过训练的日本在乡军人，携带着武器集团编队移入佳木斯永丰镇弥荣村。

日本向伪三江、吉林省移民

金名世

1934年12月1日伪三江省公署成立后，当时就知道在本省
内有两处日本武装移民团，一处是依兰县的湖南营，叫作“弥

荣村”，一处是桦川县的永丰镇，叫作“千振”，这两处武装移民团，是由日本驻依兰特务机关长兼伪满军事顾问东宫铁男抢夺中国人民的土地所创办的，这个日寇是杀人的魔王，手上沾满了东北人民的鲜血，听说他在1932年的秋季，以收买的名义，强行占领了湖南营和永丰镇，即由日本搬来武装移民团，霸占了这两个地方，以后日本向东北大量移来开拓民，可以说是由这两个武装移民团所开始的。我在伪省长任内，在1936年春季，因为伪民政部大臣吕荣寰专为视察这两个移民团，当时我曾陪同前去，知道“弥荣”的移民团长是宗光彦，又在同年的7月日本“梨本宫”来伪满视察，也到佳木斯来看这两个移民团，当时也是由我陪同前去的，我想伪三江省公署成立后，对于这两个移民团，是一定予以援助便利那是必然的事情。

我在伪吉林省长任时，吉林省的日本开拓团，就我所知的是有两处，一处是舒兰县水曲柳，一处是桦甸县八道河子。对于水曲柳开拓团，因为我在任时，未曾去过，不知有多少开拓民和开拓地。关于八道河子开拓团，在1942年12月，因为我新到任赴桦甸县初度巡视，经过该地，曾视察该开拓团。在这个开拓团，有日本开拓民约近200户，有700多人，有小学校一处，有小规模医院一所。据当时伪县长赵振邦说，桦甸县共有土地20万垧，除桦树林子区的土地未被收买外，其余14万垧土地，都被强行收买，因为日本对美英开仗，开拓民来不了，所以只成立八道河子开拓团。我在这个开拓团视察时，曾对日本开拓民讲话，大致说他们由日本内地来到现地，对于山川气候想有不适合的地方，要他们忍耐，更说他们担负开拓任务，对于日满两国的共同开发共存共荣是有重大关系的，勉励他们要努力于现地民族协和等等。这是我在伪吉林省长任时，不仅强行收买人民的大片土地，造成人民的破产流离失所，走向贫困死亡

的道路，并且曾亲对日本开拓民讲话，安慰他们，鼓励他们。

等武部六藏任伪总务厅长官后，不仅强行收购池沼地、原野地，并且强迫收买人民的大片熟地。据我所知道的，吉林省桦甸县共有20万垧熟地，就被收买了14万垧，因为日本发动战争，开拓民前来不多，收买的大部土地撂荒。以后我任伪吉林省长时，在1943年春武部六藏代表伪满政府发表收买郭尔罗斯前旗土地共为18万垧，也就是除了该旗岗地4万垧外，是全部都被收买了。关于买收土地的各项事务，是由伪开拓总局直接办理，对于收地后撵走的人民，命由吉林省安置处理。当时伪吉林省公署接到这项命令后，即由省政会议决定派伪开拓厅长华荣栋带领工作人员分别到农安和前郭旗现地，把被撵出的人民分批安置于农安县的各区，总共是9万多人。这项土地收买后，举行修造水田工程的开工式，以武部六藏为首的伪满中央首脑全体都现场出席，我也是参加的一人。

又在1944年1月，武部六藏发表伪满政府实行东辽河治水工程，决定在吉林省通阳县赫尔苏建筑水库，节制下游水流，开辟沿河两岸稻田，作为移入日本开拓民用地。这次强行收买赫尔苏村上等熟地1万垧和水库下游沿河北岸怀德县熟地约2万余垧，关于收买土地各项事务，仍由伪开拓总局直接办理，对于赫尔苏村水没地的人民约有1万人，怀德县被撵走的人民约近2万人，当由通阳、怀德两县自行分别安置于附近各村。在强买这两处土地的时候，伪吉林省次长饭泽重一要求我亲到现地宣抚以便人民了解，当时我因携同伪民生厅长路之途到赫尔苏村和公主岭两地，对被收买土地的代表讲话，劝解他们要认识国策谅解政府的办法。

当年强行收买这三处土地时，伪开拓总局所发给的地价一般都是最低的，较当时的时价相差数倍，即或认为是一等地所

给的最高额，尚不到时价一半，并且这种情况是绝无仅有的。至于赔偿费和迁移费更是有名无实，所给无几。被收买土地的人拿着所得价款，搬到别的地方是绝对不能购得土地房屋，当时就造成破产的状态，因之走上流离失所贫困死亡的必然道路。这种移进日本人就是消灭中国人的恶毒办法，是当年日寇危害东北人民的最重大的事情。回想当年伪满政府强行收买开拓用地，据说约有一千数百万垧，其中包括熟地约有400万垧左右，被撵走的人民至少也有数百万人，人民所受的伤害，是不可估量的。

为日本移民造水田

曲秉善

1943年4月，我当伪四平省长后，继续进行前伪四平省长徐家桓的四平省开拓年计划。这个计划是由伪满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决定的，它是以东辽河治水的招牌，在梨树县东辽河赫尔苏修堰堤一个，在其下游东辽河的沿岸造水田农地，从日本移入开拓民。关于水淹地的收买是1943年4月上旬进行完的，总共有2万垧。1943年4月中旬，我任四平省伪省长，在省公署内设立了一个东辽河开发局，局长由伪省次长关口保兼任。决定先在二龙山、老公林子等三处造水田农地5万垧，以后再继续造。全部经费都由伪满国库负担，约9000万元伪币。每年动员约4万名勤劳奉公队和2000多劳工，他们每天只吃600克粗粮，或发霉的苞米面，根本没有菜，睡在潮湿的土炕上，每天工作时间12小时以上，挖土量超过3立方米。1944年7月和1945年7月，我以慰问为名到梨树县二龙山、老公林子去视察。

我对劳工们说，劳动是人的天职，兴家立业无不赖于劳动，通过你们的劳动，能锻炼你们的身体，又给国家实行了开拓政策。你们要高兴地努力劳动。这些人的患病率是2%以上，死亡率是1%以上。为了给工地运送物资，经常征用梨树县内人民的大车，平均每月100辆，其中损失率是15%以上。赫尔苏的堰堤在1944年夏完成了5万垧，1945年8月全部完成。由于日本投降了，日本开拓民也没有进来。四平省内共有12个日本开拓团，日本开拓民11 000户，分散在东丰县的莲河、开原县、昌图县、牯牛哨、双辽县的双山等处。这些日本开拓团都是我到四平省以前入殖的。

日本移民强占土地并改造水田

黄富俊

1942年12月我任兴农部伪大臣时，出席日满开拓委员会会议。日本曾于1938年确定移民计划（20年移民500万），在新京设立开拓总局，同时成立日满开拓委员会。自1939年实行移民直到“八·一五”，6年的过程中所得的结果：（1）开拓总局由1938年冬，用一年多的时间，在三江、北安、龙江各省70多个县靠警察的力量强买去人民的土地3 000万垧（内有熟地200余万垧，荒地每垧由1元到2元，熟地由20元到40元），土地是农民的生命，日本侵略者用如此代价抢夺去，等于断绝农民生命。（二）日本拓务省规定移民计划，最初每年定为25万，以后又减到10万，但由于日本的农民不愿意来，又加他们的运输力不够，实际6年仅移来开拓民10万。开拓总局为了安插这10万

人，竟撵走了东北的农民百余万，让出熟地百余万垧（这是根据拓务省计划实施的）。这些被撵走的农民无家可归，有的投亲靠友，有的因流浪无业被抓去作劳工。所让出之熟地，开拓民未能按照计划全来，竟至撂荒七八十万垧，这是帝国主义殖民政策给东北人民带来的灾难。我在1939年当龙江伪省长时曾帮助开拓总局收买南部九县土地400万垧，在兴农部伪大臣任内，曾出席三次开拓委员会会议，通过了开拓总局每年所定的安置移民计划，对东北农民造成了极大的痛苦。

1944年5月参加郭前旗新开稻田插秧式典，这项稻田建设是由开拓总局承办，3年完成，资金2亿元，由日满分担，法令由兴农部制定，于1943年1月通过国务院会议公布，生产大米尽数供给日本（日本因进行侵略战争消耗人力过多，影响农村生产，要拿东北人民力量为其生产大米弥补军用，所以武部六藏曾经说过这项稻田的开辟是政府当前最紧要的工作）。开拓总局于1943年2月着手在郭前旗收买土地18万垧，梨树、双辽两县收买土地6万垧，滨江、松花江沿岸（地点忘记）收买土地6万垧，共30万垧，同年6月由吉林、滨江、四平三省征集劳工11万人在郭前旗、梨树开始修筑水库（在郭前旗地名忘记）和沟渠工程。我去郭前旗的时候，水库和沟渠的工程已大部完成，但因抽水机不够用和日本开拓民未能照计划来到，仅种稻田3000多垧，但是对人民的危害，有5万户以上的农民失掉了家屋和土地，11万的青年抛弃自己的生产为敌人服务，受包工的日本把头们虐待，有2%人死亡。在郭前旗一个地方，因修水库、沟渠占用的村落，即撵走了5000户以上的农民，断绝了他们的生路，其余未走的农民也不过是苟延残喘，将来日本移民来到，他们就都成了无家可归的人了。当时出席会场的村长和工人代表们所表现出的痛苦不安情绪是我亲眼目睹的。

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东北的 移民侵略

李作权

一、“九·一八”事变前的移民

移民是新老殖民主义者向外侵略扩张的重要手段，一切殖民主义者都毫无例外地向它的殖民地附属国进行大量移民。

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很快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制定了一条吞并朝鲜，侵占中国东北，进而征服全中国，称霸亚洲的基本路线，即所谓“大陆政策”。向我东北进行移民，正是“大陆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使我国东北殖民地化的重要内容和手段。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殖民政策的炮制者儿玉源太郎和“满铁”第一任总裁后藤新平以及“关系都督”福岛安正等在策划成立“满铁”时，就公然鼓吹移民的重要性。早在1909年，日本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在国会上提出了“满鲜移民集中论”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向我东北的移民侵略活动就开始了。

最初的移民是1914年“满铁”铁道警备队退伍兵组成的铁道自警村和1915年“关东都督府”在辽宁省金县魏家屯组织的“爱川村”。前者是向“满铁”沿线，即“满铁”附属地入侵，后者是向所谓“关东州”地区入侵。日本参谋本部用秘密军费开支资助“满铁”500万元，作为移民事业经费。在“满铁”附属地中划出大约11200亩土地，移入了铁道警备退伍兵1100户，建立了铁道自警村。1915年和1916年先后从日本山口县移民

32 户，到我东北金县，建立了“爱川村”。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进一步扩大移民，1928 年“满铁”在公主岭和熊岳城两地建立了“农事试验所”，训练移民骨干。同年在大连设立了“大连农事股份公司”，负责制定移民计划和办理“商租”土地等事务。在日本政府中专门成立了“拓务省”，加强对移民的统一领导，积极推行移民政策。

总的来看，在“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帝国主义已积极推行向我国东北移民的侵略政策，但其阴谋未能完全得逞。其主要原因是受到了东北人民的抵制和反抗，英勇的东北人民为了反对日本侵略者掠夺土地，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其次是日本帝国主义统治集团的内部认识不一致，组织不统一，措施也不完备，以至向我东北的移民进展迟缓。

二、武装移民

日本帝国主义对我东北的大量移民是从“九·一八”事变之后开始的。这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我国东北，为它的移民政策的推行创造了有利条件。主要是可以通过傀儡政权，毫无限制地掠夺土地，以处理旧有的官、公地为名，吞并了清室残留地、吉林旗属官地、吉林驿站官地、吉林官仓之田、奉天省官地、东省特别区官地、“国有荒地”和“国有林”等大量土地。以后，又实行“地籍整理”，用“收买”强制剥夺了农民的大批土地。“九·一八”事变后，移民政策的积极推行者石黑忠笃、加藤完治和宗光彦，就迫不及待地向日本拓务省当局提出了一件所谓《满蒙移殖民事业计划书》，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以及参谋坂垣征四郎、石原莞尔，提出对中国东北的大量移民是绝对必要的，认为移民可改变民族的成分，会使日本人成为我东北各民族的“中坚分子”，它也是“日满不可分的纽

带”。总之，就是企图通过移民，使我国东北日本化，彻头彻尾地沦为日本殖民地。

日本移民政策的积极推行者加藤完治，于1932年5月就匆忙奔赴奉天（沈阳），与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与东宫铁男密谋，决定以日本在乡军人为主募集移民，在我东北北部设置10个“屯垦队”，1个团为500人，分10个团共计5000人的移民计划。由关东军的东宫大尉负责现地安排，加藤完治负责在日本国内募集和运送。日本方面的送出机关是日本拓务省，伪满方面接收单位是关东军特务部。当时正值犬养内阁于5月垮台，永井柳太郎就任拓务相，积极推行移民侵略政策。日本第六十二届临时会议通过向满洲移住地及产业调查的经费100544元，随后在同年8月30日的第六十三届临时议会又通过了“第一次满洲移民五百名”，经费预算207850元，称之为“第一回试验移民费”。

在移民侵略政策的推行者的策划和日本政府的直接领导下，第一次试验移民于1932年9月开始，从在乡军人中选拔了492人，送往日本茨城县友部的日本国民高等学校、岩手县六原道场及山形县太高根道场等三个训练所进行训练之后，于10月5日从日本神户出发，10月14日到达我国东北佳木斯。这次移民叫“佳木斯屯垦第一大队”。在佳木斯停留半年，于1933年3月到达永丰镇，建立了“弥荣村”移民团。这次移民完全按照军队编制，编为4个中队，12个小队，日本陆军步兵中佐市川益平任大队长。全大队除每人配备步枪一支外，还配备有重机枪4挺，迫击炮两门，因而这种移民又叫做武装移民。

日本对东北的武装移民，从1932年到1936年7月共移来五次：第二次是1933年7月移到桦川县七虎力附近建立“千振村”，团长宗光彦；第三次是1934年10月移到绥化县瑞穗村，团

长林恭平；第四次是1935年9月移到密山县城子河和哈达河，团长佐藤修和贝沼洋二；第五次是1936年7月移到永安屯、朝阳屯、黑台、黑台信浓等4地。5次移民共计2900户，7260人。在此期间还移入了“集合移民”4个团，208户，766人。

武装移民是这个时期的主要形式，是这个时期移民的基本特征，所以这个时期叫做“武装移民时期”。这种移民的侵略性最大，给中国人民造成的灾害也最深。“佳木斯屯垦第一大队”的第一次武装移民，在佳木斯一登陆就全副武装杀气腾腾地在市区“示威行军”，承担了佳木斯市区的警备任务，并不断派遣移民和关东军一起进行“讨伐”，残酷镇压东北人民，成为镇压中国人民的“宪兵”和掠夺我国东北资源的强盗，给我东北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

“九·一八”事变后到1936年这个阶段中，日本向东北的移民，除具有武装移民的特点外，还带有试验的性质。这是由于日本武装占领东北后，东北人民的反抗斗争风起云涌，日本对东北的统治还不够巩固，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刚刚建立，还处在“整備”阶段。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对东北的移民确实带有试验性质和准备性质。

武装移民和“九·一八”事变前的移民有很大的不同，有了新的特点：首先是改变了由“满铁”等所谓民间机构组织领导的方式，而由日本公开的、直接的组织领导；其次是改变了自由松散的移民方式，采取了以集团移民为主的、由在乡军人组成的军事化的武装移民；最后是在移民区域上，改变了过去局限在东北的南部，所谓“满铁”势力范围内的情况，而主要移殖到我国东北的北部。

三、大规模的移民

经过5次武装移民，日本帝国主义得出了“满洲农业移民不是不可能的”结论，在1936年制定了百万户移民计划。从此，真正开始了大规模的移民侵略活动。

早在1934年，关东军就召开会议审议移民政策问题。同时，在日本国内和伪满洲国都建立了庞大的移民机构。日本政府内主管移民的主要是拓务省、陆军省、农林省、内务省和对满事务局，日本各府、县、厅以学务部职业课主管移民事务，山形、长野等5个移民较多的县则专门设立了开拓课。1935年4月伪满政府民政部地方司设立了拓政科，7月改为拓政司。1935年10月，日本拓务省组成“海外拓务委员会”，并在东京成立了“满洲移民协会”，1936年1月和9月先后成立了“满洲拓殖株式会社”和“满鲜拓殖株式会社”，做为推行移民政策的具体实施机关。

1936年关东军召开了第二次移民会议，拟定了《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草案。随后，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选派关东军顾问稻垣征夫（原日本拓务省殖产局农林课长）去东京，和陆军省军务局及拓务省联系，并将该方案提交日本政府有关部门。日本政府广田内阁采纳了这一方案，定为七大国策之一，于1936年8月25日发表了这一方案的要点。《广田内阁七大国策》的第六项中写道：“确立对满的重要政策，移民政策以及鼓励投资，等等”。伪满傀儡政权也将移民政策做为它的三大国策之一（三大国策，即“北边振兴计划”、“产业开发五年计划”和“百万户移民计划”）。

日本“向满洲移住农业移民百万户计划”，以20年内移民百万户、500万人为目标。计划从1937年起，用20年的时间，移

民100万户，每户平均5人，即第一期（1937年—1941年）为10万户、50万人，第二期（1942年—1946年）为20万户、100万人，第三期（1947—1951年）为30万户、150万人，第四期（1952年—1956年）为40万户、200万人。这一庞大的计划，其侵略目的是很恶毒的，它的阴险用心就是在20年后，500万日本移民将占东北总人口的十分之一以上。当时预计东北总人口在20后将达5000万人，而日本500万移民再加上自然增殖的人数，甚至可达东北人口总数的五分之一左右。这样，通过改变东北人口的构成，使日本人不仅仅是东北各民族中的“优秀核心力量”，而且在数量上也占据很大的比例。从而实现吞并东北，永远霸占东北的侵略野心。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因此，推行大规模移民政策，是其变东北为其扩大侵略战争的物资供应基地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1937年8月，“满洲拓殖株式会社”扩大为“满洲拓殖公社”（简称“满拓”），成为国家性质的集中统一的“国策的实行机关”。“满拓”掌握输送移民，办理移民金融，负责处理移民的物资购买和贩卖，为移民提供土地和贷款，从事移民训练等等，握有很大权力，享有种种特权。伪满傀儡政权为了适应大规模移民侵略，由关东参谋长、总务厅长官及伪满有关大臣组成了“拓殖委员会”，并于1938年1月将拓政司扩大为开拓总局，各省、县也相应地设立了开拓厅和开拓科。

由于移民政策是日伪统治当局的国策，正像移民侵略的头子、“满拓”事务长稻垣征夫所说：“满洲移民本身存在特殊重要性……即建国精神”，正因为移民是为了“建国”，所以在1939年将移民改称“开拓”，移民团改称为开拓团。

大规模的移民侵略计划中，将移民区分为两种。一是甲种移民，也叫做“集团移民”。这种移民由日本政府直接组织，200

户到300户组成一个开拓团或开拓村。另一种是乙种移民,也叫“集合移民”。这种移民由民间组织。此外,还有分散移民、铁道自警村移民和青少年义勇队移民。

集团移民是大规模移民侵略的主要形式,而从1937年开始的集团移民,又主要采取了“分村分乡”的形式,就是把日本的一个村或一个乡做为母村,从中分出一部分农户,组成一个开拓团,移到我国东北建立一个分村,或叫子村。日本宫城县南乡村的移民到黑龙江省的黑台开拓团,是分村移民的第一次。以后日本长野县大向日村的居民450户分出200户移到我吉林省舒兰县。1937年的第六次集团移民的18个团中,就有11个团是以分村的形式组成的。这种分村分乡的办法,可以把日本农户全家送出,增加移民数量,减少移民本人及其家属的阻力,并可利用乡邻、家族关系,使移民能长期在我国东北居住下去,防止中途离团回走;另外还可以利用“母村”、“子村”的关系,互相支援,进一步扩大对我国东北资源的掠夺。1937年到1941年的第一期移民五年计划中,集团开拓民23806户,74507人。

集合移民是一种较次要的移民形式,移民的数量也不如集团移民多。这种移民到1941年底已移入5043户,15107人。至于分散移民和铁道自警村移民的数量则更少,分散移民中有的专门从事烟、酪、林等特产物的经营。

青少年义勇队是日本移民的一种形式,它是由移民侵略者加藤完治提出,东宫铁男发起。在武装移民时代,就有3次共84名青少年,做为试验移民到我东北,在吉林省饶河县创建了“大和村北进寮”。

1937年“满拓”在日本,募集了322名青少年,在黑龙江省嫩江县创办了“青少年农民训练所”。1938年1月,日本拓务省拟定了《满洲开拓青少年义勇军募集要纲》,在东北各地大办

青少年义勇队训练所。招募16岁到19岁的国民高等小学或中学的青少年，进行为期三年的训练，然后组成义勇队开拓团。随着侵略战争的扩大，十四五岁甚至十三岁的青少年也在招募的范围内。《冰花——一个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队队员的自述》的作者中田庆雄就是一个国民高等小学的学生，刚刚14岁，在日本军国主义教育毒化下，做为一个青少年义勇队的队员，来到我国东北，进入勃利训练所。

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东北建立了大量青少年义勇队训练所，仅黑龙江省到1939年就建立了94个。到1945年为止，来到我国东北的日本青少年义勇队训练生共达86530人，仍在训练所者有2.3万人。由训练生组成的开拓团，从1941年到1944年共4批，计243个，占一般集团开拓团422个的一半还多。

青少年义勇队不仅仅是一般开拓的后备力量，而更重要的是军事上的后备力量。适龄的队员被征当兵，所以它又是日本侵略军的现地兵源。尤其是日本投降前夕的1944年和1945年，大量的青少年义勇队的队员补入关东军，担负着守卫军火仓库、军事工厂和铁路的任务，以镇压东北人民。1945年8月苏军出兵东北后，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垂死挣扎，关东军曾命令所有青少年义勇队训练生全部加入战斗部队，企图进行顽抗。

日本帝国主义为进行大规模的移民侵略，除制定20年百万户移民侵略计划外，于1939年还制定了《满洲开拓政策基本要纲》，这是积极推行移民侵略政策的行动纲领。在《要纲》第一，基本方针中规定“满洲开拓政策是日满两国为一体的国策，为建设东亚新秩序，以培养确立道义的新大陆政策之据点为目的，特别是以日本移民为核心和各种移民及原住民的协调，巩固日满不可分的关系，建设民族协和、增强国防及振兴产业并兼有恢复和发展农业为目的。”并在第二，基本要领中详细规定了移

民的种类、掠夺土地、开拓团的经费、领导、募集、训练和保护等各种具体政策。根据这一《要纲》的要求，又发表了一系列法令，其中主要的是《开拓团法》、《开拓农业协同组合法》和《开拓农场法》，即所谓开拓三法，对移民组织的性质、组成、管理、财务、土地等都给予了法律上的承认和保护。这样，不仅仅推进了百万户移民计划的实施，而且起到了加速吞并我国东北的作用。使日本开拓团融合原住民，向一般行政机构过渡，建立包括原住民在内的混成村，开拓团长当村长。到1940年已有25个开拓团，改成了伪满洲国的新基层行政村。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经济直接深入到东北的广大农村。

从1937年开始的大规模移民侵略，到1941年的第一期的五年内，共移入日本移民85086户，这是日本移民侵略最猖狂的时期。从1942年实行第二期移民计划，由于处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兵源的缺乏以及军事工业的急剧膨胀，农村劳动力已感不足，但日本侵略者不顾其国内实际情况，于1941年末通过内阁会议仍作出了《满洲开拓第二期五年计划》的决定，不仅妄图完成原定的第二期移民20万的计划，还要把第一期未完成的部分补齐，即从1942年到1946年移民21.8万余户，青年义勇队13万人。为疯狂进行移民侵略，甚至1945年4月还进行了第十四次移民，把日本群马县“甘乐乡开拓团”、“下仁田开拓团”移植到黑龙江省海伦县。日本侵略者由于战争的节节失败，注定了大规模移民侵略的野心无法得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人民进行的抗日战争，在国际反法西斯阵线的配合下，取得了伟大胜利。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它的大规模移民侵略计划也宣告彻底破产。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止，日本向东北的移民共有10600户，31.8万人。

四、东北人民的深重灾难

日本帝国主义的移民侵略，给东北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由于移民主要是农业移民，掠夺土地是进行移民的必然前提条件，而广大农民被剥夺了土地，丧失了重要的生产手段，则是移民的必然结果。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使开拓团攫取大量土地，采取了种种办法，如果说在“九·一八”事变前主要是通过“商租”的形式掠夺土地，而傀儡政权建立后，实际上是采取了强占的办法。一是以“国有地”、“公有地”之名进行强占；二是以没收“逆产”之名进行夺取；三是通过极低的价格强行“收买”；四是利用驱逐和屠杀中国人民，制造无人区的办法，掠夺耕地。不论哪种办法，都是对祖国东北土地的掠夺。其中以低价“收买”和制造无人区的办法对东北广大农民的危害最大，给东北人民造成的灾难也最深，也是日伪统治者大量使用的手段。

所谓“收买”，实际上等于强占。1932年10月到达佳木斯的第一次武装移民，共占4.5万町步（每町步9.918平方公尺），其中大量涉及到民有地。在关东军的东宫铁男以伪吉林军顾问名义的具体策划下，以“东亚劝业株式会社”为工具，进行土地“收买”。当时依兰县的地价每垧是：

熟地：上等121.4元、中等82.8元、下等58.4元。

荒地：上等60.7元、中等41.4元。而当时“收买的价钱不论熟地、荒地一律每垧一元”，实际上就是强占。第二次武装移民也是如此，在移民团未到之前，由“东亚劝业株式会社”强行以每垧一元的低价“收买”农民土地。农民群众不愿出卖，不交出地契，便采取高压手段，甚至由关军东直接强制农民交出地契，驱逐农民千余户，强占土地2万余垧，杀害农民60余人。

当地人民被逼得走投无路，只得揭竿而起，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斗争，即土龙山暴动。震惊中外的土龙山暴动，打死了日本第十师团步兵第六十三联队长饭冢朝吾大佐等，给侵略者以打击。

1936年制定的百万户移民计划中虽然规定了移民用地要尽量考虑不致对原住民造成不良影响，实际上大规模剥夺农民土地的暴行，一直在加紧进行。如伪滨江省木兰县德荣村为开拓团收买土地194垧，价钱不足当时地价的四分之一。1939年，日伪在德惠县决定在松花江、伊通河、饮马河流域收买土地73713垧，其中熟地38000垧，由于人民的强烈反对，仍坚持在德惠县收买熟地5000垧。仅1937年8月至12月在吉林省敦化、桦甸、舒兰、磐石等五县即强购农民土地97000余公顷。

伪满后期，日本帝国主义实行了“农地造成”和“紧急农地造成”，更加肆无忌惮地以“收买”名义大量剥夺农民土地。根据“农地造成计划”，用东北的人力、物力、财力在松花江上游和东辽河流域等地区，为日本开拓民开辟和改良水旱田37.6万余公顷，给东北人民造成巨大灾难。仅修筑东辽河二龙山水库，就淹没村庄49座，房屋5580间，淹没土地7220余垧。被淹没的土地，又限期缴照，强行收买，迫使农民1万余人背井离乡，流离失所。

日本侵略者剥夺东北农民土地的另一种毒辣手段，是以“危险地”或“维持治安”为名，强行将人民赶走，剥夺土地。如1941年，珠河县以维持治安为名，强令该县内所谓危险地区的居民600多户，迁到伪三江省鹤岗充当矿工。1943年，伪牡丹江省宁安县卧龙山和芦家村的居民2000多户被迁到瑗珲县和孙吴县。

根据百万户移民计划，日本移民需掠夺土地1000万町步，而伪满洲国准备的土地是2650万公顷，其中耕地1300万公

顷，其余为森林或牧地。这一庞大的掠夺土地计划，虽然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失败而未能实现，但充分暴露了侵略者的野心。尽管如此，到日本投降为止，移民掠夺土地是历史上罕见的。到1944年末，移民占地共达152.1万余公顷，约占东北全部耕地面积的十分之一。仅密山县，开拓团就霸占了60万垧耕地，占全县耕地面积的80%。

由于移民占地，广大的农民被迫丧失了土地。他们除流离失所或到矿山充当劳工或给日本开拓当佃户任其奴役外，还有许多人被强行驱赶到不适于日本移民居住的未开发地去“开发”。

关东军强行收买阿什河耕地

滕利贵

驻哈尔滨的关东军第十师团参谋部，拟将在侵华战争中死亡的日军将士遗属移民到北满地区，计划在阿城县内阿什河沿岸收买14 500多垧土地，作为移居用地。收买手续委托满铁旁系会社东亚劝业株式会社办理。在第十师团樱井参谋、阿城县长、阿城县参事官和地方代表参加下，确定了土地收买价格。1932年10月着手收买，在年末将左岸约5 000多垧的土地收买完毕，并进一步继续收买右岸约9 500多垧土地。后因土龙山事件收买略有停顿，1934年3月20日收买约1 700多垧。

在关东军的支持下，东亚劝业株式会社对农民土地实行强制收买。根据该会社购地原则，只要划入范围者不论属于何种土地，皆须购买，这些土地大都是农民的耕地，迫于生计农民

不愿出卖。该会社雇佣俄人自警队员打骂威胁农民，甚至把农民监禁起来，强制签定购地合同。另外，购地价格给的太低，使农民无法弥补其损失。熟地每垧30元至70元不等，荒地每垧只有15元。当时一等地每垧200元，二等地每垧160元，三等地每垧130元；而劝业会社收买价格分别是56元、40元、24元。该会社评价员故意压低等级，把暂未耕种的原有耕地评价为荒地。价格相差悬殊，使农民失去生活之道。再一点，东亚劝业会社借口治安不好，到现地办理巨额付款的支付有危险，乃在哈尔滨市该会社派出所办理支付。每天来领地价的农民50多名，他们寄居于亲戚朋友家中，然后返乡。由于劝业会社支付地价手续繁杂，办理缓慢，以致到哈尔滨数十日尚不能领取钱款，有时逗留在哈尔滨的农民达600多名。这样延长留哈时间，即使领到地价，除去食宿费也所剩无几，农民表示强烈不满。1934年3月21日，阿城县第三区二甲农民，选举王林、王唤、马东海、张永德、张百琛等五人为代表，在哈尔滨道外成立农民办事处，反对收买土地，动员农民不缴地照，不领地价，把地照寄给农民办事处保存。3月27日，该办事处将农民陈情书托在哈逗留的日本律师内海源一郎，转交给关东军参谋长和关东宪兵队司令官。经办事处的动员宣传，卖地农民纷纷将地照寄给办事处保存，赴哈领取地价的农民大大减少，从3月28日起，每天只不过有六七八人，致使东亚劝业会社哈尔滨派出所的土地收买业务陷于停顿。

由于农民拒绝劝业会社收买土地，使该会社收买事务全部停顿。尤其是日本内海律师同情农民，认为东亚劝业会社强制收买行为，是属于不人道的，倘若该会社态度不改，他自己将作为农民的先锋，决心奋斗到底。故内海律师4月5日去新京，向关东军参谋长和关东宪兵司令官提出陈情书，再向军方陈情

和上访。关东军特务部接到此种情况报告后，立即派东福一等主计到当地设法解决，并表示，不管有何等反对行动，坚决按既定的协定价格收买。第十师团滨田大尉也表示：农民有任何其他反对策动，军方也坚决按既定方针进行收买。为继续收买土地，镇压农民的反对浪潮，关东军于4月7日上午10时，在哈尔滨北满宾馆召开了收买土地对策协议会，参加会议的有：关东军参谋沼田中佐、梅谷移民部长、东福一等主计、东亚劝业株式会社花井专务、农民代表内海律师、哈尔滨警察厅代表等。会议开始时，沼田参谋威胁说：“阿城县土地收买不单是民间会社的营利事业，而是国家拟将满洲事变阵亡病故将士家属作为移民的深远国策，东亚劝业株式会社是代行收买事务。因此，尽管农民中间有若干反对，军部的方针也是按既定方针进行，请农民代表等深刻谅解此点，妥善处理。”接着梅谷移民部长又强硬地要求内海律师与本案断绝关系，他说：“关于阿城县内的土地收买，虽从最初起在农民中就有若干反对之声，但左岸已收买完毕，右岸的收买也在进行之中。但因内海律师的关系，收买事务不得不全部停顿。阁下的介入使此项收买愈益困难，进而我国策也有受到很大影响之虞，故请作为日本国民即与本案断绝关系。”内海律师当即表示歉意称：“最初接受农民关于该问题的委托时，完全看作是东亚劝业与农民之间的问题，从自己的天职维护私权的立场出发参与此事，并非是如何煽动农民，以引起提高价格的运动。会后一定将当局的宗旨传达给农民，返还他们寄存的地照，与问题断绝一切关系。”由于农民方面的代表内海律师完全转向关东军方，遂使此事告一段落。会后，关东军命令内海律师在两日内向农民代表传达当局意图，返还地照和解除约定，并且在东亚劝业株式会社花井专务监督下实施。至此，在关东军的胁迫下，农民的要求一项也没有实现，东亚

劝业株式会社继续以低价强制收买农民土地，仅仅在地价交付办法上，谋求某种对策，缓和与农民的紧张关系。

伪铁岭副县长强占农民耕地

22

滕利贵

伪铁岭县副县长古田传一，于1939年4月17日到任后，计划将自己兄弟为中心的乡里移民团移入该县，企图为自己家族获得比一般开拓民更多的利益。所以，在实行开拓民移入计划时，低价强制收买熟地，无代价征用建筑材料、劳力、马车等，使当地住民遭受相当大的损害，以致引起住民的强烈反感。

伪铁岭县原副县长小岛龙象，企图把铁岭县肥沃土地辽河流域作为日本移民地区，计划移入同乡村民，建立所谓熊本村。事情败露后被迫离职。古田到任后立即去现地调查，发现他的前任眼力确实不错，这片土地大有前途，乃使其兄弟古田喜七郎等组成移民团占据这一地区，建立古田家族移民区。古田传一立即着手低价强制收买原住民的耕地。首先收买本地居民吴敬烈在该县新台子村845亩水田、36亩旱田。包括水利设施在内时价约6万元，而古田传一与县开拓股长丸山今朝寿共谋，用1万元强行收买。吴敬烈不同意。1939年5月下旬，古田传一将吴敬烈传唤至县公署，对吴说：“收买移民地是国策，你赶快答应吧。”吴敬烈不答应，要求增加地价。古田便命令丸山今朝寿将吴监禁在伪县公署达10天之久，每天都对吴拳打脚踢数十次，还威胁说将其土地没收。5月30日达到了目的，吴敬烈被逼无奈交出全部土地。

1939年6月初，古田传一滥用县长的权力，强迫汤牛堡子村陈景新出卖旱田109亩，并威吓说：“不出卖就是违反国策，不管有何理由也得出卖。”时价约796元的耕地，结果用162元将该地收买。同时指使丸山今朝寿等，用极低的价格收买铁岭县新台子村李国昌旱田33亩，时价约1320元，只用500余元将该土地收买。1939年12月初，古田传一将奉天市任叔令传唤至县公署，威胁说：“违反国策是绝对不行的”，强令其将旱地262亩出卖，时价约10480元，结果用4716元把该土地收买。古田传一用同样手段，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强制掠夺了数千亩耕地，拟将这些土地留作自己家族享用。为此，古田决定在汤牛堡子村建设日本移民居住区。1939年7月中旬，古田令县土木股长无代价地征用20多名农民，砍伐松树182棵，为日本移民建造房屋。9月21日，冒用县长官之名发出公文，强令各村准备移民建筑用材，于10月10日运至移民区现场。各村屯按土地数量分摊，所用材料及搬运费均未付款。1939年10月下旬，古田传一无偿地征用新台子和汤牛堡子村民工，修筑从移民地到新台子站的公路，并在道路末端修建农业仓库，两村被迫按土地数目出工，仅新台子村就供出民工1632人，汤牛堡子村61岁的吴赵氏，因自己15亩地（时价900元）被移民区白白占用，实属太不讲理，乃向其苦苦哀求，说应该给一定的价款。古田传一竟用手杖压在吴赵氏的头部威胁说：“像你这样的东西，就不是满洲国民，应该把你驱逐出境。我問你还想要脑袋吗？”终于强占了吴赵氏15亩土地，分文未给。

古田传一的残暴行为，引起了当地居民的极大愤慨，很快在全县形成了一个抗议浪潮。一些受害者纷纷向有关机关提出请愿书，要求日伪当局惩办古田传一，返还被强占的耕地。1940年2月26日，受害最大者吴敬烈向日本驻伪满大使馆、开拓总

局长、奉天省长、铁岭地方检察院、铁岭宪兵分队提交了返还收买地的请愿书，同时向铁岭县长提出解除收买土地契约的要求。其请愿书如下：

“自大正九年以来，我一直居住在铁岭，历尽千辛万苦，所得无几。康德二年春，开始经营农业，在铁岭县孤家子村或收买荒地，或租借荒地，发展到今天经营百余垧的水田。康德六年四月四日，铁岭县当局突然向我发出威胁的命令，说：‘孤家子村是日本移民地，从今年春天就要移民。’要我把所有的水田全部卖给县政府，赶快交出地契。四月二十日，因被催促前赴县公署。古田副县长和丸山今朝寿股长对我说：‘凡是康德五年以后购买的土地，都违反了本县土地买卖令，要无条件没收。但是为表示同情，可按原价支给你钱款，地契由县方保管。’当即将地契扣押，并向现地派出农事监等，开始耕种土地。我遭此灾难，深疑县当局之所为，希望能得到公正解决。”

由于古田传一民愤太大，其行为直接影响日本移民计划的实施。为了安抚当地居民，伪地方检察当局对古田传一罪行进行调查。调查后确认其事实无误，拟起诉古田副县长。但此事受到伪满政府的干预。伪中央政府认为，古田事件是由于“古田等忠实地推行日满开拓国策而酿成的事件，且古田等又无私之事实，当无构成犯罪之理由。如按法律判罪，可谓有违国策。”极力为古田传一罪责开脱，袒护其所作所为。同时认为检察当局调查此事件，对开拓国策产生影响。“基于此种论据，乃非难检察当局而维护被告”。最后，伪中央政府作出如下解决办法：1、古田副县长自动离职；2、赔偿损失；3、向检察当局赔礼。这样，轰动一时古田强制占地事件，由于伪满政府的干预，仅以古田传一自动离职而了结。

开拓民枪杀当地农民

大濑户权次郎

1941年，我任虎林县副县长。虎林县有两个日本开拓团，即：黑咀子开拓团和清和开拓团。两个开拓团共200户，1000余人，占土地4000多垧，同时，每户有一支枪。我的任务是负责对开拓团进行指导和帮助，使其不断的扩充发展。

1941年5月，清和开拓团员和邻近的中国和气村农民因土地和伐木之事，双方发生了激烈冲突。5月10日，双方的冲突升级，因中国农民人数超过了开拓团，开拓团员多人便向中国农民开枪射击，当场打死3人，打伤多人，后来县警察局派出了武装警察镇压，事情才算平息。中国农民除3人被打死外，还打伤十几名，其中重伤5人；日本开拓民只有几人受了些轻伤。

这次流血事件发生后，我完全站在日本开拓民这一边，威胁中国农民让步，向日本开拓民赔礼表示和解。5月25日，我把双方都找到县里，在县公署举行和解仪式。然后，由县公署付给每名死者200元，受伤者只给少量的医疗费而了结。我这种处理办法是极不公平的，完全是站在袒护日本开拓民立场上，对开枪打死人者没做任何处理。

对中井久二强迫移居的控诉

王登明 郭世宏

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的移民侵略始于1936年的《百万户移民计划》，同其加紧战争准备与掠夺资源的所谓《北边振兴计划》和《产业开发五年计划》一起，称之为伪满的“三大国策”。移民计划以20年以内移民100万户，500万人为目标，从1937年起，每5年为一期。伪黑河省为移民重点地区，“开拓第一线地带”。

日本开拓民虽然在政治、经济地位上，是中国农民无法比拟的，但绝大多数日本开拓民和被剥夺了土地的中国农民一样，是普通劳动者。他们在日本军国主义的威逼利诱下，走上了“开拓”之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政策的受害者。

由于日本移民的入侵，使千万中国农民被剥夺了土地，正如日本回顾开拓团生活的书中写道：“与其说白给一样的购买莫如说强夺了土地”。这里选录了瑷琿县一些当事人的控诉：

关奎英：我自1937年2月至1944年10月，在伪黑河省瑷琿县公署实业科任科员职务，我知道中井久二任伪黑河省次长时，于1939年6月12日领导开拓厅办理移民事宜。情况是：

在伪满时办理开拓移民是由伪黑河省公署开拓厅开拓科负责，协同当地县公署及警察署等组织办理。名义上采取土地房屋依价收买，而实际上是被强迫搬家，指定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另设村庄。原来农民耕种的肥沃的土地作为移民用地或军

事用地，情况是非常惨的。在瑷琿县境内被迫搬家的有下列几个屯子：

屯名	上马厂	西山后	法别拉	达音卢	大呼屯	大颡尼河	小颡尼河
户数	50	30	71	34	17	1	12
耕地	60	40	90	30	11	30	10

注：还有托力木、叶集屯、梁集屯、老青屯，户数不详

范传译：1939年2月至1942年，我曾任西岗子中队任过警尉补。当时正是中井久二任次长，他以次长职务批准并下令以军事区域为名，驱除4个自然屯的居民，即老青屯、叶集屯、梁集屯、托力木屯。将这4屯150余户，老幼居民649人驱出原住舍，并采用强制手段，规定有限期限内迁至荒草甸子上，建设新屯（即现在的新民屯）。如过期不搬者即用炮弹将房子炸毁，违者严惩。当时正处中井久二掌实权之际，除省长、次长之外，其他官员是无权批准这项重大事务的。

陶平升：（原住瑷琿县黑河镇五街三组。后住瑷琿县法别拉屯）。伪满康德6年（1939年）5月间，中井久二当时任黑河省次长，他派省公署开拓厅及县公署工作人员到我们屯子里，命令法别拉全屯在6月1日前迁移搬家，并说：“你们全屯都搬出去，给日本开拓团用。”经全屯老百姓再三哀求，最后又告诉我们延期到12月1日搬完，并说“如果到期不搬，你们再进屯，就用枪打死你们”。到12月1日那天夜里，强迫搬出了法别拉屯。

我们屯当时共74户，300口人，1000多垧地，就这样被迫送给日本武装开拓团用了。当时我们那个屯都是几十年的老住户，搬出屯子后，全屯老幼哭的哭、喊的喊，无家可归，东奔西散，尤其是正值腊月寒天，受尽冻饿，搬到新地方房屋土地皆无，再加上换水土，有的得病死了。

叶德祥：我是伪黑河省瑷琿县西岗子村托力木屯被驱逐的居民，当时在该村当屯长。1939年6月，瑷琿县县长和开拓科科长（日本人）坐着车到我们屯，说：上七屯、下四屯都属于军事用地，你们在这里住有妨碍，限你们在10月末以前撤离该屯，如果到期不撤就什么也不让拿，净身出屯。这样，逼得我们全屯72户老的哭，少的叫，背井离乡离开了自己双手建立起的故乡。他们霸占我们168间房子，650垧地，使我们无家可归，流离失所，这些罪都是伪黑河省次长中井久二指挥干的。

郭万玉：原住瑷琿县新民屯。1939年6月我在瑷琿县西岗子村梁集屯居住，正当我儿媳妇勾彩环（18岁）生头一个小姑娘刚四五天，日本人带着翻译坐着汽车到我家说：“这里是军事要地，不准你们在这里住，限你们在10月末前撤离该屯，如果到期不撤，就什么也不让拿，净身出屯……。”当时儿妻得了惊吓病，过了几天就死了，小女孩因没有奶吃也死了，造成我家破人亡。还有我们屯里的韩福忱，他在那儿开磨坊，因着急搬家损失大，一股急火也死了。他们驱逐我屯26户老百姓101名。霸占了我们全屯108间房子，400多垧地。

孟双全、纪荣惠、张风林、张有恒：我们都是伪黑河省瑷琿县西岗子村梁集屯一起被驱逐的居民。1939年6月，瑷琿县公署的日本人和中国人坐着汽车到我们屯子里，强制我们搬家，说这是军事用地，你们在这里有妨碍，限你们在10月末前搬出，如果到时不撤就撵，净身出户，什么也不让拿走。那时郭万玉大儿媳妇勾彩环年18岁，才生小女孩不几天，听了这事得了惊吓病，不几天就死了，后来那个小女孩也死了。还有韩福忱在那屯子开碾磨房，因搬家，碾磨未拿出来，损失很大，一股急火也死了。

（摘自《黑河文史资料》）

大野乡开拓团始末

任梦里

大野乡开拓团位于今盘山县陆家乡陆家村西侧。1941年4月建立，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而解体。它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的产物，是日本关东军侵占东北，直犯中原，以战养战的兵源和给养的“小基地”。

移日民，兴办大野乡开拓团

194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日益升级，为满足和适应战争的需要，按照“昭和十年往北满迁移九个开拓团”的规划，这年4月满洲拓殖株式会社选择了距沟帮子火车站较近，土地面积广阔，水源充足的双台子河与太平河交汇处，即今盘山县陆家乡陆家村西侧兴办大野乡开拓团。

满洲拓殖株式会社兴办大野乡开拓团，采取先占地，后移民的方式。由日方在伪满盘山县指导部的指导官颯泽直接出面，以低价购置土地，伪满盘山县警务科紧密配合。购置方法，是先由陆家村村长苏朋阁按大野乡开拓团的规划范围，通知所涉及的地主到县里办买卖手续。“大友公司”、“大一公司”等大地主虽多有权势，但也只能对村民农户，而面对横行无忌的日本关东军，也只好乖乖地交出土地，求安保家。至于普通农户，更是无力反抗，最后，所有大野乡开拓团规划范围内的土地，均以每垧300元的伪满纸币“卖”给了大野乡开拓团。那些普通农户土地出售后，多数只好以高租金租种大野乡开拓团的土地或

到大野乡开拓团打短工养家糊口，成了地地道道的大野乡开拓团的佃户。

大野乡开拓团共购置土地800余垧，下设三义农场。共有土橡房4栋，300余间，其中团部处有2栋，三义农场2栋。移日民350余人，约100户，多数是从日本北海道迁来的。这些日本农户，拖儿带女，异国拓荒，内心苦闷，忧虑重重，但他（她）们从不在中国人面前表露出来低落情绪和发泄牢骚。

开拓团团部设正副团长。正团长尾加丰次，当时40多岁；副团长门前先后生；会计上田勤；总务佐本。团部下设配给站，由团长直接管理，方式是“三统一”：日民的生活物资，包括吃、穿、用等一切物品统一由配给站定期发放；各户秋后收获的粮食统一送缴到大野乡团部，由团部负责保管，听候调运；各日民户在生产旺季缺乏劳动力，由团部统一雇工，分配到各农户后由日民支配劳动，工后由团部开钱。管理和控制手段比较严格，团长的权威至高无上。日耕民辛苦不堪。

大野乡开拓团以旱田为主，多是种植“大蛇眼”高粱和大豆。在地势较低、上下水方便的地块种些水稻，品种是“白王”。种法极为粗糙，田块灌水后，将水稻种漫撒下去。上水方法前期是自然式，即潮涨灌上，潮落下排。后来在部分较高地块用“老头咳嗽”（即小型柴油机）灌溉。平均产量300~400斤左右。粮食收到团部后，由团部负责装成草包，以便外运，多数用于关东军的军粮，部分飘洋过海，运到日本。

重盘剥，大野乡开拓团罪行累累

大野乡开拓团的盘剥罪行：一是对内，团长等公事人员的生活与日民生活截然不同，团长身穿呢料，家有钟表，一日三餐菜肴丰富；而日民生活却很艰苦，主食靠供给，副食靠团田

的自种蔬菜。但日民的等级观念很强，认为当官的穿得好，吃得香是天经地义的，从不攀比，表面上也看不出有什么抱怨情绪；二是对外，也就是对邻近中国农民的盘剥，手段有两种：一种是高地租，日本人坐收渔利。特别是沿河地带，地势低洼，既没有防洪工程也没有排涝设备，几乎年年有洪涝之灾，而定的高租也从不减免，中国农民将所收成的粮食交租后，多数所剩无几，过着吃糠咽菜，沿街乞讨的生活。另一种是生产季节雇用打零工的农民，特别是生产旺季，一天雇工达500余人，团部将雇工分到各日民户后，由日民分配活计，规定数量，监督质量。雇工们按劳动数量多少由日本各农户发给劳动工票，由雇工本人到大野乡团部领取工钱。雇工们劳动强度大，时间长，但工价低得可怜，男壮劳动力一天只能赚5角，女工只能赚3角钱。当地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大野乡，地莖长，日不落，汗水淌，扎破脚上鞋，接断破锄杠，赚来三五角，回家哄儿郎”。尽管这样，日本人的钱也是很难赚到手的。日民们对雇工监督很严，时常因质量不好，遭到日本人“叭嘎呀路”（混蛋）的骂斥和扣工钱。雇工们每逢遇到这种情况，知道和日本讲不出道理，只好回村找当时做邮差的陆家村民刘景新乞求。由于刘景新经常给大野乡开拓团团长及公事人员送信和邮包，时间长了，有些私人感情，靠这种关系打通关节，村民们才可以把工钱拿到手。

反侵略，村民智斗开拓团

大野乡开拓团对陆家村民的盘剥，加剧和加深了民族矛盾，村民们经常采取各种手段进行反抗斗争。一些有经验的村民，口说甜蜜话，手干糊弄活，弄得鬼子干吃哑巴亏。陆家村民邵玉海等多次包抹大野乡开拓团住房的房顶，他们以稀泥水浇的办

法，一天就抹几十间，日本人只见房顶见新，不知质量好坏，更不晓得村民是捉弄他们，每逢六七月间阴雨连绵，连日不开，家家房子漏雨。气得日本人哇啦哇啦乱叫，骂天天不晴，怨陆家村民又找不出破绽，丝毫没有办法。有一年，大野乡开拓团找刘自学等几人给他们垒墙，这几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心里可有数了，谁也不真心给日本人卖命。他们垒土坯墙不用泥，搞干打垒，既省工又省劲还多赚钱。天气入伏后，几场大雨，干打垒的墙几乎全部倒塌。日本人只好望天兴叹。

当地群众看到日本人在中国的土地上耕种，都非常气愤，一些村民和儿童时常公开结伙到开拓团的田地里摘取各种蔬菜，村民与日本人的矛盾不断加剧。一次牧童刘伟业放牧时和几个孩子结伙到日本人园地里摘蔬菜，不慎被日本人捉住，将他们绑在日民住宅前的木桩上，施以烈日曝晒和殴打。任家村民王××，只摘日本人园内一根黄瓜，便遭追捕，王某无处可逃，跳到河中躲避。日本人不能下水，便在河的两岸坐等捉人，王某既不敢上岸，也不能寻路逃走，只好久站河心，潮涨时，活活地被淹死。

（摘自《盘锦文史资料》第三辑）

日本帝国主义“满洲”移民纪略

邓 鹏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移民侵略活动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即初期阶段、武装移民阶段、大规模移民阶段和最后阶段。

初期阶段（1905年—1931年）

1905年，日本帝国主义通过日俄战争攫取了对中国辽宁省旅大地区的租借权和从长春至旅顺的铁路以及与此相关的一切权益，将东北南部划为其殖民势力范围。1906年，日本设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满铁”）和关东都督府（以后军政两部分为关东军司令部和关东厅），具体实施殖民统治。

与此同时，所谓“满洲移民论”开始在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形成。满铁首任总裁后藤新平提出的满铁经营方针是：“第一经营铁路，第二开发煤矿，第三移民，第四发展畜牧农工业，其中尤以移民为要务”。他认为：“通过铁路经营，如能在10年内将50万国民移入满洲，俄国虽然强大，亦不敢轻易同我挑起战端。和战缓急之主动权将依然在我手中。纵令俄国一战败我，我亦不失卷土重来之要地。”1908年6月，后藤新平在向日本内阁总理大臣提出的备忘录中再次鼓吹“满洲移民论”。日本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也在1909年召开的第25届帝国议会上积极鼓吹所谓“满韩移民集中论”。

最初的移民主要有以下4种：

1. 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本独立守备队的退伍兵移民。满铁认为，退伍兵大多是农家子弟，具有从事农业生产的经验，经过一段时间的服役又对中国东北的地理气候、风土人情有所了解，如果将他们移入铁路沿线，可以起到移民和守卫铁路一箭双雕的作用。满铁的移民计划得到日本独立守备队的支持，1914年第一批退伍兵移民进入满铁附属地，至1917年总人数为34名。

2. “爱川村”移民。爱川村是日本侵略者在中国东北建立的第一个日本移民村，村址在辽宁省金县大魏家屯。1915年，19

户日本移民进入移民村。由于绝大多数移民来自山口县玖珂郡的爱宕村和川下村，所以该村取名为“爱川村”。

3. 大连农事株式会社移民。大连农事会社是由满铁出资在1929年4月设立的专门移民机构。1930年至1931年，大连农事会社在夹信子、李家屯、赞子河、杨树房、金厂沟、三十里堡、小莲泡、旅顺等8个农区共移入日本移民74户。

4. 零散的移民。零散的移民是一些未经日本殖民当局或移民机构招募自行移入中国东北的日本移民（这类移民当然也得到日本移民当局各种形式的帮助）。据有关史料记载，第一个自行移入中国的日本农业移民是东京人小出英吉，他先作为翻译随日军来到东北，1907年辞职后，在普兰店种植水稻。零散的日本移民主要分布在旅顺、大连、熊岳城、凤凰城、抚顺、奉天、长春等地，从事水稻、果木、烟草的种植。

武装移民阶段（1931—1936）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武装占领中国东北阴谋的得逞，使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更加嚣张，一时间，向中国东北移民的喧闹声甚嚣尘上，各种各样的移民计划竟达80多个，又一次掀起向中国东北移民的恶浪。在此期间，日本各地的军国主义分子和拓务省、关东军充当了急先锋的角色。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国内以茨城县国民高等学校校长加藤完治为首的“加藤集团”最为活跃，他们奔走游说于日本政界、军界和学界，极力鼓吹向中国东北移民是所谓大和民族的“民族膨胀运动”，其“成功与否”是决定日本在东洋能否成为强大国家的关键，“是解决起因于‘土地饥饿’的日本农村问题唯一道路”。因此，日本移民到满洲“尽日本农民之本分”，不

仅是“堂堂正正之事”，而且是“作为日本人的天职”。1932年，加藤集团制定了《满蒙殖民事业计划书》（称“六千人移民案”），强调：“目前是满蒙殖民千载一遇之绝好机会”，加藤集团的活动得到日本拓务省、陆军省和农林省有关人员的大力支持。1932年3月，拓务省在东京召开由各有关方面参加的“满洲移民问题恳谈会”，此后，拓务省又以加藤集团的“六千人移民案”为基础，制订了《满蒙移殖民计划》，并向日本内阁会议和议会提出。

与此同时，日本关东军亦在积极策划大规模的移民活动。他们认为，要在中国东北实行殖民统治，必须使大量的日本人“真正成为新国家的核心”，进行移民“是绝对不可欠缺的事业”。

在关东军已经确定移民东北的侵略方针的情况下，东宫铁男的一系列活动对移民政策的实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九·一八”事变后，东宫铁男出任伪满军队的教官和伪满洲国军政部顾问，在同抗日义勇军李杜部队作战的过程中，他多次向关东军提出“以日本在乡军人组建屯垦军基干部队，永驻吉林省东北地区（现黑龙江省合江地区）”的建议。其主要目的是：由屯垦军代替部分日军，执行镇压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任务；加强“对苏国防”，在战时编入关东军战斗序列；掩护日本普通移民。1932年6月，东宫铁男在奉天与赶至东北的加藤完治就移民问题进行会谈，具体规定了第一批日本在乡军人移民团的人数、移民时间、组织形式和移民地区等，双方还对实施第一批移民的准备工作做了分工。

此后，拓务省、加藤完治集团和关东军及东宫铁男等人沆瀣一气，互相勾结，共同推行向东北移民的侵略政策。1932年8月，日本内阁会议及第63次临时会议通过了拓务省的移民方案和移民费用预算，决定当年秋季，向中国东北的依兰地区移

入500名武装移民。9月和10月，关东军又制定了《佳木斯移民实施要领案》和《满洲移民要纲案》，对日本移民的目的、性质作出明确的规定：日本移民“主体”要由以前的“普通移民”改为“特别农业移民”；要“在满洲国内扶植日本的现实势力、充实日满两国的国防、维持满洲国治安”。也就是说，日本移民的主体已由以前的“经济移民”变为以在乡军人为主体的武装移民，他们将充当统治中国东北的尖兵、对苏防卫和作战的军事上的辅助力量和维持东北“治安”的协作力量。1932年10月，第一次日本武装移民团侵入中国东北。至1936年，日本移民已达5次（每年一次），共移入9个移民团，3000人左右，分布在黑龙江省桦南、依兰、绥棱等县以及林口至密山的军用铁路沿线。此外，尚有约900名由日本各种团体组织的“自由移民”，主要分布在黑龙江省的阿城、宁安、饶河以及辽宁、吉林和内蒙古的一些地区。

日本帝国主义在武装移民阶段的移民侵略活动与初期阶段相比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 从移民目的来看，突出了日本武装移民镇压东北人民抗日斗争和维持殖民统治的作用。第一次日本武装移民团称“佳木斯屯垦第一大队”，按军队建制设4个中队、12个小队，并配备炮兵小队和机关枪小队。他们在佳木斯一登陆，就全副武装地在市区内进行“示威行军”，接替外出“围剿”的日军承担佳木斯的警备，还多次参与日军对抗日武装的镇压。移民团团址的选择也充分反映这种目的：第一、二次移民团均设在抗日武装活动频繁的地区；第三次移民团设于抗日队伍的主要通道；第四、五次移民团分布在军事铁路沿线，负有护路任务。第四次以后移民的募集资格，虽然废除了“必须是经过训练的在乡军人”的条件，但对日本移民充当“宪兵”的要求并没有放松。此

外，日本帝国主义亦想通过这一阶段的移民来解决国内特别是日本农村的危机，实现其“对苏战略”。

2. 从组织机构来看，由以前的满铁、关东都督府发展为拓务省、农林省等日本政府和关东军以及其他专门的移民机构。这种从当地殖民机构向政府部门和军部的变化，使日本侵略者得以充分利用国家的力量迅速扩大移民的范围和规模，使移民活动更加适合日本帝国主义的整个侵略政策的实施和殖民统治的需要。1932年第一次日本武装移民为500人，来自日本东北、北陆、关东等寒冷地区，而1936年第五次移民，人数增至1100人，募集区域亦扩展至除冲绳岛以外的整个日本。在此期间，日本帝国主义还在中国东北和日本国内建立起一些专门的机构，具体办理有关移民事务。“满洲移住会社”成立于1935年11月，主要在日本国内从事移民的募集、训练、输送及宣传。1936年1月，经日本大藏省、陆军省、拓务省认可，由伪满政府、满铁和日本三井、三菱财阀出资，在新京（长春）成立了“满洲拓植株式会社”（简称“满拓”）。满拓掌握很大的权力，享有种种特权，主要负责有关移民资金的贷付，设施的建设与经营，移民用地的获取、管理和分配等一切事务。

3. 从移民形式来看，集团性的移民取代了分散的自由移民，成为整个日本移民的主体。日本集团移民一般由300人至500人组成，内部组织严密，设团长及农事、畜产、警备、经理、保健等指导员，纪律严格。在东北定居后，基本形成独立的移民村，或由几个移民村组成村落集团。同时实行准军事性的管理制度，不但要进行耕作，还经常进行军事操练，甚至协助日军作战。与初期移民阶段相比，集团移民团有较大的稳定性，脱团出走者不多。这个阶段的自由移民亦大多是由某种团体组织，以集团的形式移入中国东北。如1932年11月入哈尔滨郊区阿

什河地区的日本天理教移民团，就是由日本天理教青年会会员组成的，首批200人，并建立了“天理村”。

4. 从移民地区来看，日本帝国主义进行移民侵略活动的中心已由初期阶段的辽东半岛和南满铁路沿线地区转移到黑龙江省的东部地区。移民中心的转移，除了是出于镇压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需要之外，还有另一个主要原因，即东北的东北部地域辽阔，土地肥沃，可耕地面积大大超过东北南部地区，而且人口密度很低。日本侵略者认为，向东北部移民既可获取大量土地，又可减少东北人民因丧失土地而奋起反抗的压力。

5. 从土地掠夺方式来看，“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对东北土地实行了赤裸裸的殖民主义的掠夺。具体手段是：

(1) 利用伪满傀儡政府进行全面的土地掠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占东北后，将东北的土地分为5种类型，即所谓“国有地”、“官有地”、“逆产地”、“不在地主地”和“一般民有地”。显然，日本侵略者的土地掠夺，是包括5种土地的全面的掠夺。以前三次日本武装移民团为例，第一次移民团在到达桦南县永丰镇时，就强占既耕地700町步，将当地中国农民90户约500人赶出移区，以后其掠夺土地面积达到66 000町步，其中熟地为21 500町步，占32.6%；第二次移民团共占地17 262垧，熟地12 290垧，高达71.2%；第三次移民团共占29 112垧，熟地为815垧，占2.9%，其熟地的比率低于前两次，是因为1934年春土龙山地区的中国农民进行了反对土地掠夺的武装暴动，迫使日本侵略者有所收敛的缘故。

(2) 直接的武力掠夺。据有关资料记载：日本侵略者在佳木斯附近圈定“移民垦殖区域，各地地主向日本军部呼吁，则加以‘逆产’和‘通匪’等罪状，逮捕屠杀之”。在依兰北部，“他们专威逼华农放弃他们肥腴的土地，来让日本移民占据。有

20万亩良田的地主，便被他们藉口有罪驱逐走了”。据曾为日本特务机关服务的意大利人万斯白揭露：哈尔滨日本特务机关雇用了500多名土匪，指使他们在海伦“扫荡4个乡村，腾出地方来给650名日本人居住”。土龙山事件发生后，日本军队在当地进行疯狂的报复，而大批日本移民则跟在侵略军的后面，霸占了中国农民的土地和村庄。就连当年曾任伪满参事官的日本人 also 承认：日本第10师团的士兵在中国农民家里翻箱倒柜，捣破墙壁，用刺刀逼迫他们交出地照。

(3) 强行廉价“收买”。1934年3月，关东军特务部在《吉林省东北部移民地收买实施要纲》中规定：收买荒地每垧2元至10元，熟地不得超过20元。同年6月，日本拓务省也提出：每垧既垦地价为10至18元，未垦地为2元，要以“比现在普通市价显著低廉”的价格，“在关东军的支持下收买”土地。然而，根据伪满国务院总务厅情报处的调查，当时吉林省东北部（现黑龙江省合江地区）除凤山一县外，其余10个县每垧熟地的市场地价均超过20元，最高为1557元（旱田）或200元（水田）；每垧荒地除萝北、抚远两县外，其余各县亦超过2元，最高达607元。可以看出，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土地的“收买”，与无偿霸占相差无几，其实质就是依武力变相掠夺。例如，富锦、依兰、土龙山等处，“地价一亩可值三四十元，但日寇却以每亩5元的价格强买了去”。更有甚者，竟以“1元一亩”的价格“收买”。对于不愿出卖土地的中国农民，日本侵略者或动用武力强行驱逐，或罗织各种“罪名”，没收土地，杀戮地主。富锦有一家姓王的，因不愿将自己的土地出卖，全家老小8口一齐被日寇枪决。

大规模移民阶段（1936年—1941年）

1936年，日本国内确立了法西斯统治，日本统治集团加紧准备挑起全面的侵华战争，同时，日本帝国主义认为，武装移民已经取得了成功，得出了“满洲农业移民不是不可能的”结论，开始把小规模“试验移民”（亦称武装移民）阶段推向大规模的移民阶段。在这种背景下，日本广田弘毅内阁在1936年8月25日正式宣布，把向中国东北移民作为日本的“七大国策”之一。随后，伪满政府亦把配合日本移民作为“三大国策”之一。对中国东北移民侵略活动的“国策化”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满洲移民”政策的最终形成。从此，向东北移民的“意义”被进一步发展，使“大和民族”成为“满洲国五族协和的核心领导势力”及“强化日满一体不可分割的关系”的最终目标被突出出来。根据这一精神，从1939年起，日本“移民”改称“开拓民”，“移民团”改称“开拓团”，“移民事业”改称“开拓事业”，在这种“开拓”的喧叫声中，日本移民侵略活动达到最高潮。

这一阶段的移民侵略活动，主要表现在以下5个方面：

1. 制定“百万户移民计划”。1936年5月，关东军制定了《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案》（简称“百万户移民计划”），提出自1937年起，用20年时间（每5年为1期，共4期），向中国东北移民100万户、500万人，力求在计划结束时，使日本移民数达到东北预计人口5000万的1/10。这个计划案在“第二次会议”上得到日本拓务省、陆军省、伪满政府、满铁、满拓以及加藤集团的支持。同年7月，日本拓务省又以这个计划案为基础，制定了日本政府的《二十年百万户送出计划》。1937年5月，日本拓务省发表《第一期计划实施要项》，决定从1937年至1941

年为第一期，5年间向中国东北移民10万户，其中集团农业移民7万户，一般农业移民（自由移民及商工移民）3万户，正式开始实施《百万户移民计划》。

2. 建立庞大的移民侵略机构。日本移民侵略活动的迅速扩大以及“国策化”，使以前那种主要由关东军的拓务省负责移民事务的局面不再适应移民政策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于是移民活动的主导权转归日本政府控制。在中央，除拓务省之外，还有农林省、陆军省、外务省、大藏省、文部省、厚生省、商工省、内务省、对满事务局、企画院等部门共同推进移民政策；在地方，各府县的职业课、社会课或社会教育课兼管移民事务。1940年11月，日本政府决定在各府县内设拓务课，首批设立的有山形、新潟、长野、熊本、广岛等县，未设拓务课的府县，设专管移民事务的“主事”和“主事辅”。1940年3月，“帝国在乡军人会本部”、“大日本联合妇人会”、“大日本青年团”、“帝国农会”、“帝国教育会”、“日本拓殖协会”等数十个所谓民间团体组成了“满洲开拓协力协会”，与日本政府及各府县的“海外协会”、“拓务协会”、“移殖民协会”、“移民后援会”等密切配合，共同进行移民募集、训练及宣传活动。

1937年9月1日，日本、伪满政府及满铁、日本财阀又将“满洲拓殖株式会社”扩充、改组为“满洲拓殖公社”（仍简称“满拓”）。满拓名义上为日伪合办，实质上“是日本政府的代理机构”，是具有国家性质的“国策的实行机关”。满拓的主要活动是设立及经营与移民有关的设施，向移民及移民会社提供贷款和资金，获取、管理及分配移民用地。同时，日伪还设立以关东军参谋长为委员长的“满洲拓殖委员会”，负责监督满拓的业务。1939年2月1日，伪满政府正式设立“开拓总局”，取代伪民政部的拓政司，主管日本移民事务及土地掠夺。同时，又

在日本移民集中的伪三江、滨江、龙江、牡丹江、北安、东安、黑河等10个省设立“开拓厅”，在130个有关县、旗设立“开拓课”或“开拓股”。这样，在整个东北从上到下形成一张移民侵略的黑网，把东北人民拉入深重的灾难之中。

3. 实行新的移民方式。随着《百万户移民计划》的制定及推行，日本帝国主义采用了两种新的移民方式。其一是“分村分乡”移民，其二是组织“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队”（简称“义勇队”）。

所谓“分村”移民，是以日本国内的一个村庄做为“母村”，从中分出部分农户组成移民团，进入中国东北后再建立移民村，称作“子村”。所谓“分乡”移民，是从日本国内一个地区的若干个村庄中分出部分农户，再组成一个移民团移住中国东北。1936年，日本宫城县远田郡南乡村的50户农民首先以“分村”形式编为一个移民团，随第5次集团移民进入黑龙江省密山县。1938年第7次日本集团移民又以“分村分乡”的形式在中国东北建立“大日向村”和“庄内乡”。在1939年第8次日本集团移民时，“分村分乡”形式的移民占40%，在1941年第10次移民时猛增至82%，以后最高达到95%。从1932年至1945年整个日本集团移民的组成情况来看，“分村分乡”形式的移民占74%。

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又开始组建“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在中国东北称“义勇队”），企图以未成年的日本青少年补充成年移民的不足。1937年7月中旬，关东军、拓务省、伪满有关部局、满拓、满铁等举行会议，决定由满拓立即在嫩江县伊拉哈建立“第一训练所”（嫩江训练所）。年底，来自日本长野、山形、宫城、爱知等县的319名日本青少年入所接受训练。

义勇队的募集对象是16岁至19岁的日本青少年，他们首先要在以加藤完治为所长的茨城县内原训练所接受3个月的“身心锻炼”，然后再进入设在中国东北的训练所进行为期3年的实地训练，所有队员必须身着褐色的军服，按着军队建制编为大、中、小队和班，过着严酷的军事化生活。训练内容除军事、农业和其他技能之外，更为主要的是“精神教育”，即向幼稚的缺乏判断能力的青少年灌输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思想和武士道精神，把他们培养成日本帝国主义的驯服工具。义勇队在中国东北的训练所主要设于黑龙江省，分为大（基本训练，时间1年）、小（实务训练，时间2年）和特殊训练所三种。1938年首次设立的训练所有嫩江、孙吴、铁力、勃利、宁安5个，到1945年，各种训练所已达94个，由义勇队训练本部统一管理。1941年10月，第一批进入东北的17000名义勇队员结束训练，编成68个义勇队开拓团开进移民点。至1941年，共有54394名义勇队员进入中国东北，成为日本开拓团的重要组成部分。

4. 制定移民法律。在大规模移民阶段，日本帝国主义还制定了一系列有关移民的法律，试图使其移民侵略的行径合法化、长久化。1939年12月，日伪双方政府发表《满洲开拓政策基本要纲》（简称《基本要纲》），宣称自1940年起，“满洲移民事业”实行“新体制”。

《基本要纲》体现了日本帝国主义移民侵略活动的总政策，被称为“最高宪典”。1940年5月、6月和1941年11月，伪满政府根据《基本要纲》的精神，分别公布《开拓团法》、《开拓协同组合法》和《开拓农场法》，构成了“开拓政策的基本法”，确立了日本移民的“基本制度”。这些“法”不仅对各类开拓团及协同组合的组成、财务、经营、土地等给予法律上的承认和保障，而且规定：日本开拓民占有的土地可做为“永代世袭”的

“家产”，“确保永存”。

5. 大规模的土地掠夺。根据《百万户移民计划》规定，日本开拓民需占耕地1000万町步，宅地、菜地、牧地等1000万町步，共2000万町步的土地。据统计，至1941年春，日本政府已在东北夺取开拓团用地20 026 000公顷，为日本国内耕地面积的3.7倍以上。

土地掠夺的重点地区是现黑龙江省。《百万户移民计划》明确规定了11个移民地带及其耕地面积，其中三江地带300万町步、小兴安岭南麓地带100万町步、黑河瑷珲地带50万町步、中东铁路东部地带20万町步、京图及拉滨地带80万町步，共计750万町步。至1940年底，日本政府以开拓团名义攫取土地10 678 247公顷，其中在伪黑河、北安、三江、东安、牡丹江、滨江、龙江7省共掠夺土地9 683 252公顷，占总数的91%。大量的土地掠夺给东北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

综上所述，在《百万户移民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共向中国东北移入各种类型的成年开拓民42636人，移入义勇队员54 394人，共97 030人。其中，1937年5942人、1938年27 408人、1939年17 763人、1940年19 561人、1941年26 356人。显然，这个数字与日本统治集团一再修改的计划指标，即成年开拓民77 600人、义勇队员84 600人，共162 200人相差甚远。

最后阶段（1942年——1945年）

从1942年起，日本帝国主义开始推行《百万户移民计划》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经过日本内阁会议和伪满参议院会议的批准，日伪双方于1942年1月正式发表《满洲开拓政策第二期五年计划纲要》，决定在此期间移民22万人，其中一般移民159 600

人，义勇队移民60 400人。以后，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以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局势的进展，日伪当局又相继制定《康德十年开拓政策实行方策》（1942年12月）、《关于战时紧急开拓政策实行方案之件》（1943年9月）等。与前一阶段相比，这些政策更加注重于日本移民的军事作用、对粮食等战略物资的掠夺和确保开拓民数量。这三个方面反映出日本帝国主义在走向覆灭时期对移民侵略政策作了调整，同时亦构成日本移民最后阶段的主要特征。

1. 日本开拓民的军事作用由《基本要纲》中的“建立道义的新大陆的据点”，变为“强化东北亚防卫的北方据点”。如果说日本帝国主义在向中国内地及亚洲各国进攻时，日本开拓民的军事作用是间接表现出来的，义勇队开拓团要进入“国防第一线地带”，即中苏边境地区，如果在地图上把收容千人以上的义勇队大训练所所在地连成一线，就可以看出，东起自东宁，经勃利、铁力、对店、孙吴，西至嫩江，恰好沿现黑龙江省东北边境形成一条“弓”形线，几百人的义勇队小训练所则分置在各大训练所之间，这种布局亦是出于对苏战争的考虑。一般开拓团移住在“国防第二线地带”的产业、交通、城市防卫的要害地区。具体来看，移住在基本属于现黑龙江省范围的伪龙江、北安、黑河、三江、东安等省的日本开拓民人数，已接近在中国东北日本开拓民总数的80%。

2. 在《百万户移民计划》第一期五年计划期间，日本帝国主义亦曾提出通过日本开拓民掠夺东北的粮食等战略物资，但在第二期五年计划，明确规定，要把中国东北变为“战时粮食基地”，建立“日满粮食自给体制”，要求日本开拓民在“开拓增产”中起到骨干作用，并担负向关东军和日本国内提供粮食的义务。到1944年，日本开拓民除粮食之外，还要向日本军队

提供肉类、蔬菜、干草和各种农畜产品，甚至捐献飞机。同时，日伪当局向东北农民临时开放了部分“可耕开拓地”，以增加粮食的掠夺量。

对粮食的大量掠夺进一步带动了对土地的掠夺。日本侵略者彻底抛弃了其一直标榜的所谓“开发未利用地主义”和“不买熟地的原则”。对熟地的掠夺使日本开拓民得以加速移入过程和粮食生产，但广大东北农民却因此而丧失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和家园，被迫到其他自然条件恶劣的地方开垦，成为“县内开拓民”。至1943年，东北的“县内开拓民”已达40 771户。日伪当局还计划在伪滨江、牡丹江、三江省进行垦地，以收容“县内开拓民”49 000户。在迁移和定居的过程中，“县内开拓民”历经苦难，饱受日本侵略者和汉奸的压榨，死亡率颇高。据载，1942年初日伪当局强迫东宁县石头坑子8个村屯近2000户中国农民去瑷珲、呼玛两县“开拓”，在近3年半的时间里，仅芦家一个屯就死亡287人，占该屯人数的18.1%。

为大量掠夺粮食，日本帝国主义还加紧推行“农地造成”计划。1943年9月，日本内阁通过《关于满洲国紧急农地造成事业之件》，提出1944、1945年两年间，要在第二松花江和东辽河等地区“造成”农地18万公顷。伪满政府亦公布《紧急农地造成计划要纲》，决定在近40个市、县、旗“造地”24.9万公顷，农产品“除生产者自行消费外，全部供给日本”。满拓和满洲土地开发株式会社是“农地造成”的主要机构，前者在甘南、盘山两地仅水田就计划“造成”5.6万公顷；后者至1943年末已在伪三江、龙江、滨江、牡丹江、吉林等省“造地”10万公顷。在“农地造成”的同时，东北农民的大片土地被强行霸占。据载，日伪当局为在第二松花江地区“紧急造田”，于1943年9月“收买”郭尔罗斯旗的熟地8万余垧；为在东辽河上游修筑水库，

淹没村屯近10个，数万户中国农民背井离乡，流离失所。此外，日伪当局还强迫大批中国民工从事“农地造成”工程，许多人在残酷的奴役下死于非命。至于“农地造成”的经费，亦是通过种种途径转嫁到东北人民身上。至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在移民侵略政策下，掠夺东北土地总计约达2552公顷以上。

3.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本农村劳动力不足的状况更加严重，向中国东北的移民完成率（实际移民数与计划移民数的比率）明显下降。据统计，武装移民阶段的完成率为82.7%，第一期五年计划时期为58.7%，而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即1942年仅为50.2%。1941年至1945年，日本成年开拓民移入中国东北17267人，而义勇队人数达到57100人。在太平洋战争期间，义勇队开拓团的户数为日本开拓民总户数的70~80%。

尽管如此，日本开拓民的人数依然逐年锐减，1943年日本一般开拓团的完成率猛跌至6.8%。同时，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在侵略战争中节节失败，大量青年开拓民被征入伍，日本开拓团大多是由老人、妇女和儿童支撑，到处是一片破落衰败的景象。可以说，日本侵略者的移民政策在1943年就已经失败。

（摘自《黑龙江文史资料》第三辑）

日本“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始末

刘建华

所谓的“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贯彻“百万户计划”的需要，在国内竭力征募青少年，以移民形

式送往伪满洲国，进行移民侵略。

一、“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的建立

关东军于1936年7月上旬制成《二十年百万户移出计划》的“满洲现地案”。拓务省遂以此为基础制成日本政府方案，并于7月23日送交海外拓殖委员会进行咨询后，正式确定为日本政府方案。8月25日，广田内阁会议决定二十年百万户大规模的移民计划为日本七大国策之一。

此前，东宫铁男和加藤完治等人曾于1934年9月组织了14人的“忧国前卫军青少年突击队”，在饶河县建立了名为“大和村北进寮”的日本移民村，至1937年，人数达到84名。

由于日本发动扩大侵华战争的“七·七”事变后，军队征兵，大量日本青壮年农民应征入伍，农村劳动力日益紧张，移民的来源不足，因而推行送出未成年人组成的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

1937年9月，在伪新京召开了由满洲国政府、拓务省、满洲拓殖株式会社（后来的满洲拓殖公社）、满铁、满洲移住协会等有关人员20人参加的会议。关东军参谋部以第三课的名义提出了《青年农民训练所创设要纲》，在满洲设立日本内地农村青少年训练所，招收16~19岁的青少年。经过4次会议讨论，在15日的会议上最后决定了《青年农民训练所创设要纲》。

而且，在嫩江县伊拉哈建立“第一训练所”（嫩江训练所）。9月上旬至12月中旬，从长野、山形、宫城、新潟、埼玉等县募集了319名日本青年做为先遣班，分三批进入“第一训练所”，所长由日本第一次移民团团长山崎芳雄担任。1937年8月，还建立了城子河、哈达河少年队。至1938年1月，各地的少年队成员已有400余名。

1937年11月3日，日本农村更生协会理事长石黑忠笃、满洲移住协会理事长大藏公望、理事桥本传左卫门、那须皓、加藤完治、香坂昌康等6人联名向日本政府提出了《关于编成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的建议书》。日本拓务省根据石黑忠笃等人的建议，立即制定了《关于向满洲送出青年移民之件》。并于1937年11月30日提交第一届近卫文党内阁，阁议决定，由青少年代替壮年移民，从此，“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制度正式建立了。

1937年12月22日，在拓务大臣的官邸召集拓务省、关东军、拓殖委员会、满洲移住协会、满洲拓殖公社等代表开会，确定了《满洲青年移民实施要纲》。1938年1月，根据这个实施要纲，决定了《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募集要纲》，从1月中旬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募集。

《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募集要纲》发表后，日本政府利用各种形式进行宣传鼓动工作。日本的报纸、杂志以“少年屯田兵”、“昭和防人”、“昭和百虎队”等题目，大肆宣传义勇军的“国策主义”，鼓吹去满洲建设“五族协和”的“王道乐土”。1938年1月，长野县散发了题为《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募集要纲》的宣传品，内容包括目的、募集对象、应募资格、手续、截止日期。甚至悬赏征集歌颂“义勇军”的歌曲，并发表于《开拓满洲》杂志上（昭和13年4月号）。“我们是年轻的义勇军”、“开拓行”等歌曲在电台广播，大造舆论。日本拓务省、农林省、陆军省、文部省、厚生省等上层领导机关和各府、县、市、町、村的地方机构以及满洲移住协会、农村更生协会、日本联合青年团等团体，纷纷派人四处游说。日本青年被日本帝国主义的宣传所欺骗，同时，为农村的贫苦生活所迫，纷纷报名参加。首次报名应召的就达9 950人，约为第一次募集指标的5 000人的2倍，最后录取了7 700人，5月末，募集人数达14 863人。

《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募集要纲》公布后，拓务省制定了向伪满输运3万人的计划，并向各道、府、县分配了人员数字。而且，在全国8个地区（关东地区、东北地区、北陆地区、中部地区、近畿地区、中国地区、四周地区、九州地区）召开了各地方协商会议。协商会议的出席者除拓务省外，还有农林、陆军二省以及满洲移住协会、大日本连合青年团、农村更生协会的中央团体、各道府县的社会课、职业课、移民担当课、社会教育关系课、在乡军人会友部、府县联合青年团、县农会、县产业组合联合会等部门的代表。这种各地方协商会议一直持续到战败。据《大东亚省的誓写印刷文件》记载，1944年，在上述8个地方召开了地方协商会议，会议协商制定了《关于编成昭和20年（1945年）义勇队之件》等文件。

1939年前后，实行义勇军募集的新形式，以高等小学在校生为对象，以60人为单位，编成小队的义勇军。静冈县富一郎教育会于1943年夏，设立了拓务训练所，并于1940年送出了70名义勇军。静冈县的做法扩展到全国范围。青年团、青年学校也实施了这种小队的形式。各府、县选定2~4个较合适的郡，在各郡举行拓殖训练练习。训练时间有的是4宿5天以上，有的进行8宿9天不等，但都是义勇军预备训练。

1940年，在日本内地又开展了中队编成运动，以县为单位编成1个中队的义勇军。并在全国内以小学校高年级学生为对象，通过拓殖训练讲习会等形式，进行拓殖教育。

二、对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的训练

《满洲青年移民实施纲要》中规定：在茨城县东茨郡下中妻村内原特设青年移民训练所，在拓务省的监督下，通过满洲移住协会对募集者进行约2个月的训练，训练结束后经过东京

送到伪满。在伪满洲国设置了嫩江、孙吴、宁安、铁力、勃利5个青年移民训练所，被募集的青少年接受3年的训练。

1、队员在内原训练所的训练

进入内原训练所的人员，按军队编制组成大、中、小队，过着严格的军事化生活。一个大队（由6个中队组成）为1800人；一个中队（由5个小队组成）为300人，大、中队长均由开拓指导员担任；一个小队（由3个班组成）为60人，一个班为20人。

内原训练所给队员发给每人一本《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手册》，手册的内容包括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募集要纲、教育劝语、日本国歌君之代、伪满洲国国歌、参拜形式等。

内原训练所训练科目有“皇国精神、军事训练、满洲殖民问题、满洲事情、满洲农业要点、农产品加工、建筑、修路”等等。其中重点在于精神教育方面，即向青少年灌输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思想，把他们培养成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

队员在内原训练所的训练时间原则上2个月，也有训练3~6个月的。

内原训练所各年度入所人数如下：

1938年 24 365名 1939年 9 508名

1940年 96 18名 1941年 13 335名

1942年 12 631名 1943年 11 510名

1944年 11 640名 1945年 3 848名

从1938年至1945年，加入内原训练所的队员共计96 455名。

2、队员在伪满训练所的训练

队员在内原训练所训练3个月后，即被送往伪满洲国的训练所。训练所分大、小两种。队员首先要在大训练所训练一年。1938年有嫩江、孙吴、铁力、勃利、宁安5个大训练所训练，一

年后队员转入小训练所训练两年，主要进行军事、农业及其他技能训练。到1945年止，由日本内原训练所送到伪满洲国的训练人数为86 530人（另有资料记载为91 903人，日本战败前在训练所仍有22 000人），约占日本移民总数30万人的30%。由训练生组成的开拓团共分5批，279个团。

“满洲青年移民实施要纲”中规定由满洲拓殖公社经营伪满的训练所。根据1941年5月统计，在伪满洲国的训练所共有93所。满洲拓殖公社为了经营训练所，从公社各部门抽出得力社员派往训练所，并在各训练所设置临时建设部。而且，满洲拓殖公社对其组织机构也进行了调整和扩充，先后经历了总裁室企划课时期，经营部训练课时期，训练局时期，训练部时期。

1939年12月22日制订了《满蒙开拓政策基本要纲》，根据这个要纲设立了青少年义勇军训练本部。自1940年4月，义勇军训练所的经营基本上由作为满洲国政府机关的青少年义勇军训练本部负责，拓殖公社只经营甲种实物训练所。甲种实物训练所的队员在训练结束后，作为集团开拓民在训练地区内固定。青少年义勇军训练本部指导统辖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队的训练，本部设在伪新京特别市。原则上工矿部门的训练委托专门机构，例如铁道自警村训练所。自1941年训练所的种类分为大本部训练所、中本部训练所、小本部训练所、小训练所、向导训练所5种。根据收容人员的多少确定训练所的名称，向导训练所培养指导员。

被送到伪满洲国的日本青少年，对东北的气候、水土都不适应，特别是严格的军事训练生活，更使他们难以忍受。在训练所内部，队员动辄就要受到训斥、体罚和殴打。这种法西斯式的训练，使许多队员思想动摇、思念家乡、思念亲人，充满失望和不满情绪。“屯垦病”在东北各训练所到处蔓延，自杀、

逃跑事件屡有发生。“屯垦病”是一种因思念家乡而引起的神经官能症。“屯垦病”患者分消极型和疯狂型两种。消极型患者表现为：整日沉默不语、流泪不止，又称“自闭型”；疯狂型患者表现为：施行暴力，又称“攻击型”。根据1939年8月伊拉哈训练所两年来的统计，训练所内发生火灾21件，枪击12件，危险事件12件，自杀和自杀未遂6件，擅自离所1771名（有50名逃跑），被开除137人。1939年5月昌图特别训练所甚至发展到武力火併事件。他们放火烧营房，用步枪互相射击，双方死伤7名（另有资料记载为8名），被审问的达222名，收监123名，37名被起诉，其中有32名被判罪。

日本帝国主义为稳定人心，平息他们的不满情绪，经常到各训练所放映电影，组织文体活动，并经常派由日本教师和女学生组成的慰问团。自1939年起又开始实行所谓“寮母”制度，即将25~50岁的独身女性安插在各训练所，负责照料队员的生活。面向全国募集志愿者，资格是旧制女校毕业生。满洲移住协会第一次募集时，从应募者中选出50名，先送到设在东京千駄谷的女熟圣和学苑训练所3个月，然后委托友部的日本国民高等学校女子部再进行3个月的教育。在熟圣和学苑培养她们具有女性的一般修养，在日本国民高等学校女子部，她们接受大陆的生活知识、营养知识、护理知识等方面的教育，从1938年到1945年共募集8期，人数总计是229名。

1940年又开始实行“大陆新娘”，即将日本青年女子经过女子拓务训练所训练后，集体嫁给义勇队开拓团员，组成家庭。1940年夏，拓务省在全国范围内举办女子开拓讲习会，对女子进行教育。根据1944年的“内地募集分配名额”，在长野、静冈、岩手、宫城、岐阜等县共募集520名。日本政府给每位“大陆新娘”80元补助金。

1939年11月，由47名队员代表3万多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组成当地报告队，回到日本国内进行宣传。但是，所有这些措施并未发生多大作用，义勇队员的应募者急骤减少，致使日本拓务省不得不多次缩减募集计划。

鸡西地区日本开拓团

李宝山

一、日本关东军的别动队

1906年，日本成立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并将旅大地区变成侵略我东北的桥头堡，建立了日本的海外飞地——“关东州”。从此，日本军国主义者不断派遣移民，强占土地，掠夺资源。1914年，“满铁”实行“除队兵”移民，把铁路沿线守备队退役兵组织起来，强迫他们在我东北长期定居。以后，日本关东厅又发放贷款，建筑房屋，购买农具，开发水利，种植稻田，在金州附近建立了“爱川村”移民团。1925年，又成立“大连农事株式会社”，招募日本农民，进行大规模移民。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整个东北地区，更加狂热地向我东北派遣移民。当时日本政府的拓务省，组织了专门人员，成立所谓“拓民土地调查班”，并委托专家学者对我东北农业状况、土地经营方法以及衣食住各方面开展研究，进行侵略性的考察。“满拓”（即“满洲拓植株式会社”）还以“商租”形式，用最低价格，强制“收买”农民的土地分配给日本移民。

1937年，日本军国主义者进一步把“移民满洲”作为一项重要国策，野心勃勃地提出，20年内向满洲移民100万户，500万人口，要求土地面积为99 173 600华亩的计划。这个计划是1936年（昭和10年）根据关东军主办的第二次移民会议上通过的加速实施的决议，由广田内阁决定，作为重要国策而实施的。出席会议人员有关东军、陆军部、伪满洲国政府、满拓、满铁的代表和石黑忠笃、加藤完治等有关人员。这是世界殖民史上很少见的大规模的野心勃勃的侵略计划。这个狂妄设想，不只是一要解决日本农村经济的衰退问题，主要是要在20年后，改变伪满洲国的人口构成，使总人口的十分之一成为日本人。

实际上，从1932年到1936年，日本已派遣5批、2800户移民侵入伪三江省的桦川、依兰，伪滨江省的绥棱和伪牡丹江省的密山、鸡宁等地。

到1941年12月末，日本移民团在东北各地已达49 085户，113 936人。这些移民大部分是日本“在乡军人”（即退伍军人）。他们来我东北定居后，自行组织村落，不受当地伪基层政权的管辖。开拓团内部，另有一套完整机构管理移民事务，并有自己的武装，俨然是“满洲国”的国中之国，是关东军的别动队。

日本开拓团组成人员，各有不同。一种是武装开拓团，大部分由退伍军人组成，受关东军指挥，大都分布在国境地带，负有军事和特务任务。如入殖佳木斯永丰镇的弥荣开拓团，就是由421名在乡军人组成的武装移民团。1932年10月14日，他们接受日本拓务大臣永井柳太郎的送别，高喊“万岁”涌进“满洲”。

第二种是农民开拓团。这部分人大都是来自日本各县濒临破产的农民。日本当局以“开拓满洲”的侵略口号，强迫农民

背井离乡，携妻带子，漂洋过海来到东北。他们也有武器，并接受军事训练。在日本军国主义临近灭亡时，开拓团的全部男人相继应征入伍。

第三种是招募青少年经过严格训练后遣送到满洲各地的。仅加藤完治等办的“农业学校”、训练所，就向“满洲”送了27万多毕业生。

日本的开拓移民输出，开始时是以开拓志愿者为对象招募来的，后期是以日本国内村屯为主体，强迫组织的集团拓殖，进入我东北后，建立分村，叫作分村移民，为补充人员，又从停业的产业中把转废人员组织起来成立了职业开拓民。

1937年，日本军国主义者向满蒙开发，派遣移民100万户的侵略计划刚刚迈出第一步，就遇到了困境。由于战争的扩大，日本国内推行人力和物力资源的总动员，大量征集新兵投入侵略战争，再招募成年移民来中国已经不可能，便开始建立青少年移民制度。当年11月，由日本农村更生协会理事长石黑忠笃、满洲移住协会理事长大藏今望、满洲移住协会理事桥本传左卫门和那须浩、加藤完治和日本联合青年团理事得坡昌康等人提出关于组建“满蒙青少年义勇军”的建议书，提交内阁总理大臣近卫文馨和其他有关负责人。建议书中疯狂叫嚷“将满洲建成一个以日本民族为指导的五族协和的王道国家，给东方十亿民族作出向往的启示，断绝‘日支纠纷’的祸根，不能听任赤俄觊觎满洲国，更不能使民族协和的基础，出现缺口，为东方的永久和平奠定基础，日满两国命运和前途绝不能逆转，我等根据当前迫切局势情况的了解和需要，痛感目前有必要实行向满洲移民这一国策，势在必行。而且切实有效的方法，是组建‘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特制定方案，恳请给予实施……”。根据这个明目张胆的新的侵略计划，日本开拓省于11月30日

在内阁会议上提出具体方案，经过讨论，即日通过决定实施。翌年10月开始募集，准备从日本全国各地招募900名青少年。结果，应募者超过二倍以上，随之开始组建“满蒙青少年义勇军”。当年年底，早期派出伪北安省嫩江县的伊拉哈少年队和哈达河的山形少年队，以及第二年在城子河开拓团的少年队，都随之改为“青少年义勇军”。同时又从加藤完治的日本国民高等学校以及大谷光瑞在大连郊外周水子经营的周水子少年训练所中，选出14岁以上的青少年，送往面对乌苏里江与苏联隔江相望的东部国境的饶河地区，正式成立了青少年义勇军，还把其宿舍命名为“大和村北进寮”。

总之，从1932年送出的第一批弥荣开拓团开始，接着，又分第二批千振乡开拓团，第三批瑞穗乡开拓团，第四批在鸡西地区的城子河和哈达河开拓团，以及各种“青少年义勇军”，连续向我东北派出大量的武装农民。这些人平时务农，一旦需要就武装起来，成为现役军人，实际上是不穿军装的关东军。同时，还通过这些开拓民监视当地中国居民的动向，防止反满抗日活动，他们也是不穿军装的日本宪兵。

二、鸡西地区的国中之国

在鸡西地区的日本开拓团，分集团开拓团和分散小型开拓团两种，第一批集团开拓团是于1937年进入鸡西地区的。迁入城子河地区的有251户，并带有家属445人，以城子河为中心，分居7个部落，每个部落都改为日本地名，什么东山形、西山形、向阳、新日本、北上、镜泊、大道等名称，即现在城子河、新兴、红卫、丰安、永红、永丰、东北段、一太保、红光等地，定名为城子河开拓团，团长佐藤修。

哈达河开拓团迁入166户，带来家属370人。哈达河开拓团

除本部外，还有10个部落，开拓团长叫贝沼洋二。开拓团设有农业指导员、畜牧指导员、警备指导员，并设有学校、医院、商店、粮油加工等专为开拓团员服务的机构。他们廉价雇用大批中国人，供他们种地赶车等劳役。他们在这块土地上自成系统，不归伪政权基层组织管辖。

城子河和哈达河地区，是鸡西一带主要产粮区，它南临穆棱河，北接完达山脉，东西走向，地势向南倾斜，有肥沃的耕种土地，有充足的水利资源，是我中华民族用血汗开发出来的。由于日本开拓团的入侵，它变成了日本的海外飞地。

到1940年移民团耕种土地的总面积，每年增加如下表：

年 代	城子河开拓团 (耕种面积)	哈达河开拓团 (耕种面积)
1936年	303.40 町步	216.00 町步
1937年	615.00 町步	584.00 町步
1938年	1 040.00 町步	1 047.00 町步
1939年	1 680.12 町步	1 256.20 町步

注：日本一町步等99.20公亩

在鸡西地区，除城子河、哈达河两个集团开拓团外，还有分散的开拓团。1940年4月迁入柳毛、钼路地区的有24户，97人，开拓团团长是金野善吉；迁入兰岭地区的有27户，79人，团长是藤三百一。同年12月，迁入梨树的凤山、青森地区的17户，66人，团长是阿部重雄。1941年4月，迁入平阳地区的40户，46人，团长叫坛上忠彦。1942年迁入碱场村20户，100多人。这样，鸡西地区除矿区、铁路沿线住有大量日本人外，到处有日本开拓团，并且不断扩张。

开拓团本部的附属设施有事务所、会议室、仓库、邮政办事所、精米所、酿造所、榨油所、锻工所、蹄铁所、铁板加工

所、招待所、本部职员住宅、哈达河病院、兽医室、卖店等为移民们服务部门，应有尽有。

开拓团的部落建设，是在开拓团来东北之前，通过“满拓”强制收买国境沿线的大片土地，包括村屯的所有住宅，把原住中国农民赶出他们的世代祖居的地方，强行归乡并村。腾出的房屋，就成了日本开拓团员的住宅。如哈达河开拓团本部地址，就是大地主曹家的庄园，群众叫作“曹家大院”。

当时建立的部落大体分两种，一种是分散式的叫做“分散体制”；一种是集团式的，也叫“密集体制”。集团式的部落建设（开始为四栋八户，后为一栋三户），是以住宅群为单位，周围筑成外墙，前后有大门，墙高3米，宽2米，墙外侧挖有2米深的水壕，土堤上边设有刺铁线，成为坚固的堡垒。各家之间有一定的距离，各部落之间大约相距20米到50米之间，周围有宽敞的空地。这种集体式的部落建筑，主要是为了防止抗日队伍的袭击，是开拓团初期建设村落的“安全”措施。在他们认为形势初步稳定，这种集团式建设，就暴露出弱点。它把人们限制在一个有限的空间里，各家之间往往因为一点小事，引起邻里间的不和。因此，以后建筑住宅，大部分在分给自己的土地中间建造自己可心的住宅和畜舍，逐步形成了分散式住宅。开拓团也鼓励各部落建造个人家庭住宅。这时，一阵风式的大造房屋的浪潮，开始活跃起来。建筑用的木材，附近森林很多，他们从距林口15里的山间密林中采伐，石料都是附近小山上的，烧砖烧瓦的劳役大部分是开拓团雇用中国劳力来完成的。哈达河开拓团副团长上野胜在1940年建造的住宅，有两间卧室，是在火炕上面铺上木板，再放上草垫子的日本式卧室，还设有日本型的厨房、浴池、便所。这样舒适的住宅，在当时日本本国农村，也是为数不多的。

日本开拓团也把他们的天照大神请到开拓团，在开拓民居住的附近，建了神社。哈达河开拓团在举行神社“开光”仪式时，从日本伊势神宫请来神位，命它为哈达河弥荣神社。每年举行祭日，也是日本开拓团的狂欢节日，并邀请警察、伪满国军官、自卫团长等上层人物参加仪式，还强迫附近中国农民参加。

为解决开拓团员的婚姻问题，日本当局曾大力宣扬开发满洲，作开拓团员的妻子是光荣的。所以在日本国内“大陆新娘”“开拓新娘”之风盛行。1938年8月，哈达河开拓团上野胜和菊枝就是由县的社会科介绍，在日本国内结婚的。在结婚的仪式上，新郎穿国民服，新娘穿女子青年团的制服。县知事、县学务部长也出席仪式，在联合妇女会馆举行，这在熊本县还是第一次。第二天的报纸上就登了“红太阳的结婚式”“赴满开拓团的花姑娘”的消息。哈达河开拓团笛田道雄的妻子米子是“前往大陆，当新娘”的。当时，笛田道雄在开拓团蔬菜组负责，因工作太忙，离不开身，是委托在这个时候回国迎接家属的丸山久三郎把米子接来的。新娘米子除了带自己的嫁妆和随身衣物外，还给未见面的丈夫买了许多书籍。这时开拓团长贝沼洋二也结了婚。随后远藤久义、及川赖汉也把新娘接来了。截至1938年底，哈达河开拓团迎接家属工作基本结束。

随着时间的转移，开拓团家属、孩子们增加，开拓团又开始建立学校。当时教育行政权归属于日本驻满洲国特命全权大使（关东军司令官兼）。根据全权大使训示规定，其教育方针是：一、教育要以天皇勒令和旨意为根本方针。二、彻底实现日满一德一心。三、大和民族真正取得其他民族的依赖，加强品质和实力的培养。四、养成朴素坚韧不拔的精神。五、启发学生积极学习技术技能和保健知识。用以培养所谓高贵民族的优越

感，培养效忠天皇的武士道的接班人。从1941年4月开始，日本开拓团学校名称与日本内地一样，废除寻常的小学校，改为国民学校。哈达河小学改为“哈达河公立在满国民学校”。这个学校，坐落在哈达河大地主的曹家大院里。四周是用土打成的围墙，四个墙角都设有炮楼，朝南面房檐下有大门，院内的右侧是哈达河开拓团本部，左侧是哈达河桑常小学校。墙上还挂着“帝国在乡军人会东海分会”的墨笔大字的大厚木板的牌子。小学校开始是与团本部和在乡军人会在一起的。以后学生逐步增加，又在团本部的西侧小山岗上新建了校舍和寄宿舍。工程结束时，还举行盛大的落成仪式。这个新学校，据说在开拓团办的学校里是全满一流的。这个学校开始只有一名教师，叫吉田，他担任小学一年到高小二年级的课程。学生大部分时间是自习，全员住在宿舍，男女生分住两个房间，和团本部的人在同个锅里吃饭。以后搬到新校舍，又从开拓团员选出一人担任学生生活指导，并任命两名教师，一个是佐藤，一个是佐佐木，校长是高田成章。高田校长调到北安后，继任校长叫卫藤通夫。他到任后，由于火墙太热，引起火灾，造成烧毁新校舍的大事故。当时，这是开拓团的一件重大损失，他流着眼泪向开拓团长请罪。1941年12月8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学生们的学习任务被放在次要地位，开始参加动员“粮食出荷”、“勤劳奉仕”，给应征家属干活。

三、霸占土地与种种剥削

日本开拓团是武装移民集团，带有屯田兵性质，其占用土地，绝大部分是由“满拓”以强迫手段低价收买中国农民的。在日本开拓团入殖当时，北满一带的土地价格，每垧既耕地10元至18元，荒地1元以上。可是日本军方和官办的“满拓”强行

收买时，不论现耕地还是荒地，一律按1元收买。后来，从1934年起，日军把土地收买业务，交给了伪满政府。伪满政府定的土地收买价格是每垧荒地2元，既耕地20元。实际收买时，又把荒地和熟地合起来算每垧只给4.2元。据曾给开拓团当长工的赵玉杰回忆，1932年满拓收买土地每方（45垧）熟地只给250元，撝荒地仅给2元钱。由于这种强抢、霸占，夺走了中国农民的饭碗，因而在东北地区，经常发生中国农民反抗日本开拓团的事情。1934年发生的“土龙山农民暴动”事件，就是中国农民反抗日本开拓团强征土地的典型事件。土龙山的农民暴动发生的原因是伪依兰县公署遵照日本人的旨意，多次为日本移民抢占土地，收缴我民间武器。同年夏季收缴了湖南营和孟家岗的部分地照，秋天又在各保进行私枪登记，准备缴枪。这时，土龙山的农民愤怒起来了，联络各保发动武装暴动。五保群众在景振清父子率领下开始造反。当地豪绅谢文东利用这一契机，钻进暴动队伍，夺得暴动的领导权，围攻了日本千振和弥荣开拓团。关东军饭冢大佐率人马，向土龙山进攻途中，被暴动队伍包围在土龙山的峡谷中。经过激烈的战斗，打死了日本黑龙会健将，两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饭冢大佐、铃木少尉以下21人，俘虏了伪军依兰地区警备司令部参谋，打死了县警察大队长盖文义等人；同时打死开拓团5人，重伤5人。事件的规模虽然不算太大，却严重动摇了日本开拓团员的情绪。用当时开拓团负责人的话说是，“危及开拓事业的前进”。哈达河开拓团贝沼洋二深怕“土龙山事件”在哈达河重演，便极力鼓吹“农民无国界”，“五族协和，开发满洲”用来麻痹我国农民。城子河开拓团长佐藤在《农业与经济》中写道“收买土地问题，是最伤脑筋的一件麻烦事，特别是涉及房子的收买，把当地人动员到边远的地方去，弄不好就要出乱子”。哈达河开拓团的上野胜说：

“中国人表面上装作平静，没法子，可是许多人在内心存在反抗情绪。”

在哈达河开拓团中，开始时是禁止开拓团员雇用中国农工的。后来，随着日本不断扩大侵略战争，大部分青年开拓团员被应征入伍，家中只剩下妇女和孩子，不雇工是种不上地的。一些在开拓团本部工作的人，家里也需要雇佣劳动力。同时，雇用农工可以不劳而获，这自然是侵略者乐于干的事。所以当时家家都雇用中国农工，不少开拓团员实际上变成了经营地主。对于中国农民来说，由于土地被满拓强占，失去了谋生的土地，也只得出卖劳动力。这就为日本开拓团使用廉价劳动力，提供了大批雇用对象。同时，中国农民为日本开拓团当农工，还可以减轻或免除部队征用义务劳役，所以，到日本开拓团当长工、打短工的中国农民越来越多。

日本人除雇用中国农民作劳工外，也出租土地，收实物地租。当时哈达河开拓团的地租标准是收获量的50%，用开拓团员的话说是“一半一半”。借用耕畜、种籽、农具等，要交4%~5%的租金。开拓团还经常强迫中国农民做无报酬的公务劳动和无代价的家庭帮工。在殖民统治下，中国农民不仅是日本开拓团的剥削对象，还是日本殖民者任意驱使的牛马。

当时给日本开拓团赶车种地的吴玉发（现住哈达河村、85岁）老人，曾给开拓团的十几户日本人赶车种地，干了七八年，到头来连个老婆也没娶上，打了半辈子的光棍，解放后才成家立业。在哈达河居住的佟双臣，原来家里有四五方地。日本人实行归乡并屯时，硬把他家的土地以每垧3元的地价强行收买，把他的房子也给烧掉了。没有办法，他只得租日本人高桥家的地种，每垧地收成二石，要用一石交地租。曾经居住在哈达河的李奎恒（现在城子河矿区居住）说：“日本人熊人的办法可多

了，租了他们的地，除了要地租，还得给他干零活，年节还得送礼，不然，来年就不租给你地种。他们也放高利贷，出租马车。农忙时用人工换马工，他要多少就得给多少。”农民王国祥说：“谁家的猪、鸡跑到日本人的地里，不是罚款，就硬扣下牲畜。小孩到地里拣野菜，被他们看见也是非打即骂，无处说理。”日本开拓团不但占有耕地，周围山林也归他们所管。中国农民冬天上山打柴，拾些树枝，日本开拓团看见就没收，强迫把干枝送给他家。谁要得罪日本人，就说你“反满抗日”，抓进宪兵队。在政治上，中国人的一切行动，都要受日本的监视。稍有不满或有反满抗日活动，就会被逮捕监禁。原哈达河地区的屯长李奎一，由于对日本入侵占他的房子不满，被日本宪兵队半夜抓走，一去杳无音信。

1943年，伪满洲国实行了街村制建设。哈达河执行村屯制后，把哈达河开拓团改为哈达河村。开拓团长是当然村长，他的助理是原哈达河保长李奎一。各区长改为屯长，大部分都是日本人担任。屯以下设“排”。

（摘自《鸡西文史资料》）